

· 书籍与档案 ·

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

曾纪刚

内容摘要:开化纸之于古籍版本学、藏书史,特别是清代武英殿版图书的相关研究,夙负盛名且具有独特的指标意义,更广受藏家爱好。本文综合目前考察所及的文献史料,尝试梳理出一条重新认识开化纸与追寻古籍开化纸印本的理路,并力图追寻能使文献记载与存世实物相互验证的线索。首先,透过清季民初读书人与藏书家的文字记述与整理研究,大致确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人已普遍将清官武英殿刊白纸精印图书认定为开化(花)纸或桃花纸印本;直至四十年代末,有关开化纸的材质特征与鉴别标准,才开始出现比较具体的论述观点。其次,将视角转向藏书目录、特别是民初的营业书目,探寻开化纸印本栖身其间的踪迹,并且从最贴近社会脉动的价格变化,体察图书市场上书因纸而贵的交易生态。然而,几乎所有书目著录的开化纸印本,一旦对应到存世实物或取文献档案相验证,势必出现难以跨越的断裂,似乎只能勉强接受“开化纸实即连四纸”或“连四纸讹呼为开化纸”的说辞。为突破此一困境,乃据清代内府遗存档案史料,证明清官确有办买开化纸的惯例,实则钦天监用以刷印数量最少、开本最大、装潢最华丽的时宪书,是清代国家礼制运行的重要元素。本文以实证改写过往古籍开化纸印本研究与清官武英殿刻书紧密系连的定论,为学界接续研究开化纸之相关问题指出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开化纸 开花纸 桃花纸 连四纸 武英殿 殿本 时宪书

纸张研究在版本学或书籍史的学术领域中,向来扮演着辅助版本鉴别以及考察工艺发展、出版环境、阅读风气的重要配角,却很少有某个特定种类或名称的纸张能够像“开化纸”(或称“开花纸”、“桃花纸”)一样,几乎被认定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鼎盛时期皇家出版图书的御用纸品,象征当时造纸工艺“登峰造极”^①的标杆与典范,并且至今犹有丰富的书籍实物流

①《申报》(上海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九月九日,第21699号,第13版。(转下页)

传存世,持续牵引着人们关注、爱好的目光,进而带起热衷收藏与实验探索的活动能量。

近年学界有关开化纸的研究讨论逐渐深入,开始重新审视过往承沿既久的认知观点。有学者遍索文献史志,论证明代开化纸之原产地当在江西省广信府,称作“开化”或非指地名而是一吉利用语,后人以“开化纸”指称清内府刻书所用之“连四纸”,很可能是因为混淆比附而造成的讹呼误传^①。也有学者进一步探究康熙年间采买连四纸的来源,应该在安徽省宁国府泾县一带,与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缮写北四阁书所用榜纸来源相同;更采取科学检测的方式,分析所谓“开化(花)纸”书页残片的纤维成分,确认皆为纯青檀皮^②。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考察角度和专业领域层层推进,让人们对于这种充满传奇性格与神秘色彩的宫廷印书用纸,逐渐产生更清晰而真切的认识。

本文撰作动机,出于力图建立一条学习与探索的思路,去理解、质疑、猜想与验证历来种种有关开化纸已经作出结论或者还说不清楚的地方:古籍之有开化纸印本的书例,最早起自何时?人们是如何谈论开化纸书的?开化纸为何和清宫武英殿精刻精印的皇家出版品紧密扣连,几乎成为“殿版”善本的代名词?读书人或藏书家一致赞叹开化纸精雅绝美的鉴赏特征,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在交易热络的书籍流通网络里,哪些书籍是公认的开化纸印本?同一种书,开化纸印本和其他纸张印本的身价相距几何?前人遍寻不着开化纸印书的文献实证,诸多刷印、装潢殿版开化纸书的史料记载却纷纷指向连四纸,难道人们习称开化纸只是单纯的讹误?抑或其实连四纸就是开化纸呢?倘若清宫用开化纸印书之名确非空穴来风,那么清代内府是否真正使用过开化纸?又用在何处?印造何书?今日欲探求古籍开化纸印本的传存踪迹,还有哪些值得参考依循的线索?以下,谨就目前搜采所及的文献史料,并参据供职古籍典藏单位所见相关书籍实物进行综合查考,

(接上页)《瑞典亲王游华印象》:“清乾隆时代,开化纸已登峰造极。有清中叶有连四纸,价廉工少,于是开化纸成为古物……瑞典现代造纸颇发达,纸质虽优,但工料之细尚不及中国之开化纸……本人在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见之殿版书,系用开化纸所印,其五彩图画,完全用最白之开化纸所印成,数百余年不退色,且鲜明如初绘。”本文所引用《申报》资料,皆使用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申报数据库”检索。

①王传龙:《“开化纸”考辨》,《文献》2015年第1期,第15-23页。

②易晓辉:《清代内府刻书用“开化纸”来源探究》,《文献》2018年第2期,第154-162页。

易晓辉、田周玲、闫智培:《五种清代内府刻书用纸样品纤维显微分析与鉴别》,《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8年第6期,第53-63页。

尝试回应个人遭遇的若干疑难困惑,立足于前贤耕耘创获的经验,再向前跨进一步。

一、满纸盛名的形成脉络

根据目前考知的文献记载,至少在明代中期,“开化纸”即以一种独立的纸品名号,登诸史传志乘。成化时,浙江布政司参议卢雍(字廷佐,江宁人)查办一起伪立债券的诈欺案,隔离讯问涉案人并取双方各自供称用来写立书券的“开化纸”与“姚黄纸”^①为证,一白一黄,纸色、材质迥异,不啻自相矛盾,卒令二名合谋者俯首认罪^②。同样在成化年间,莫旦任职浙江绍兴府新昌县学训导期间撰有《大明一统赋》,叙及天下物产时,尝罗列若干纸张种类,作为所谓不可尽述之昭代“器用饮食”的注脚,当中即出现“开花纸”一项^③。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后,在江西省抄造办送宫廷御用各色纸张中,则屡见如“白开化纸”、“小样白开化纸”、“白大开化纸”、“大样白开化纸”等名目^④。然而,对比于史籍明确记载,万历末年刷印《永乐南藏》使用连四纸(上等经)、公单纸(中等经)、扛连纸(下等经)^⑤,续补刷印《永乐北藏》《道

①宋代竹纸品名。施宿:《会稽志》卷十七《纸》云:“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注曰:“学士以太守直昭文馆陆公軫所制得名,邵公以提刑邵公鯨所制得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84页。

②详见倪岳:《青溪漫稿》卷二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1册,第344页。

③莫旦:《大明一统赋》卷中,第十二节。《四库禁毁书丛刊》第2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郑普刻本影印,第40页。注文所列纸名包括:大纸、棉纸、金花笺、青纸、竹纸、蠲糊纸、开花纸、白礞纸、排册纸等9种。又,嘉靖时南京上元县主簿刘钊、江宁县县丞张中立刊《大明一统赋补》卷二增窜注文,另标细目,“器用”一目下有:彩笺、折笺、刺笺、粉笺、花笺、蜡笺、火纸、绵纸、竹纸、青纸、金花笺等11种;“家器”一目下有:泾县纸、蠲糊纸、建德纸、开化纸、绵茧纸、常山纸、排册纸、桐山纸、白鹿纸、玉板纸、连三纸、咨呈纸、分水纸、古干纸、金线纸、奉化纸、云母笺等17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嘉靖刊本,叶二十八至三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大明一统赋补》与此同版,误著录为“明弘治间刊本”。

④参考王传龙:《“开化纸”考辨》,第18-19页。材料出自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八,宫爱东主编:《南京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明刊孤本方志专辑》,据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线装书局,2003年,第466-468页。

⑤详见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四九《南藏目录》附《请经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4册,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金山江天寺影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南京僧录司刻天启增修本影印,庄严出版社,1996年,第220-224页。

藏》用白连四纸,《番藏》用白鹿纸^①,至今尚未考见明代有以开化纸印书的史料线索,遑论实物传存。那么,读书人或藏书家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共同的认知并且相互谈说某书系用开化纸所印?又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逐渐赋予或叠增开化纸印本的艺术特性、审美品味与收藏价值?以下,且就目前搜采所及若干史料略加梳理,尝试勾勒出开化纸暨开化纸印本博获书林盛名之梗概。

不仅明代暂时找不出以开化纸印书的确切实证,综观有清上下三百年,似乎也要迫近十九世纪末叶,始见学者与藏家直接点出某书为开化纸印本,将之写入日记和私人藏书目录。清同治六年(1867)四月,曾国藩赴故旧挚友莫友芝住处赏观近年所得书,赞叹其收藏颇富;当中有几部善本,令曾国藩印象特别深刻:

内有汲古阁开化纸初印《十七史》,天地甚长。又有白纸初印《五礼通考》,其朱字相传系秦文恭公手校。又有通志堂另刻之《礼记释文》,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诗》。均善本也。^②

恰巧,莫氏同样将前一年秋天在上海获藏《十七史》的书缘记录下来。他曾指出,汲古阁校刊《十七史》“多据宋元旧板”,诚然有其史学文献价值,只不过自己新收的这部初印本,既深富学术品味,更有可观之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注云:

(汲古阁《十七史》)初印本邵位西言吕鹤田有之,邵亭又见陈息有一部。邵亭丙寅秋在沪收一部桃花纸印者,绝宽大,盖康熙中印,亦精好醒目。惜其中《三国志》《晋书》《唐书》乃以书业堂翻本单宣城纸印插入。^③

古籍初刻初印之本,倘若巧妙结合纸张细致、刻工精湛、墨色妍丽等特点,往往最能展现绝佳的视觉效果和美感体验;加之《十七史》卷帙颇多,书册装帧宽大敞阔,无论插架陈列或展卷赏读,都教人沉浸在恢弘眩目、珍稀精雅的

①《酌中志》卷一八《内板经书记略》载:“《佛经》一藏,计六百七十八函,十八万八十二叶,共享白连四纸四万五千二十三张……《道经》一藏,计五百十二函,十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九叶,共享白连四纸三万八百九十七张……《番藏》一藏,计一百四十七函,十五万七十四叶,共享腰子白鹿纸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张。”《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据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潘氏刻海山仙馆丛书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49页。

②王启原:《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据清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刻本影印,第866页。按,秦文恭公即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与徐乾学之《读礼通考》,素为曾国藩所服膺,尝于奉讳家居期间,朝夕研校。

③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2009年,第197页。

艺术氛围中,“摩挲爱玩,手不忍释”^①。从这二段文字,不难察觉:至晚在清同治时期,人们已经习惯使用“开化纸”或“桃花纸”来指称一种抄造质感特别细致悦目的书籍印刷纸张,且有别于常见的“白纸”,是为一种独立纸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甫登进士第未及半载的胡祥鏊为粤商徐润撰写六秩寿辰征诗文启示,述及徐氏藏书中最为珍贵者,当属全套以开化纸刷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初印本。启曰:

先生不儒而贾,然酷嗜图籍,宜雅宜风……藏书富有,而以宝铭斋开化纸《图书集成》万卷、殿版初印《二十四史》全帙,尤为希世珍。其他海外图书,亦多善本,不敢自秘。辄以泰西石印、日东铜版,翻译精审,饷遗来学。^②

光绪八年(1882),徐润和堂弟徐秋畦、徐鸿复共同创办上海同文书局后不久,便自北京宝文斋重金购得“殿板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③,规画征求“股印”(以优惠价格预订印售的行销方式),运用新兴的石版影印技术推出缩印本进军图书市场牟利。光绪十年,石印本《二十四史》顺利面世,《古今图书集成》则因对手复制相同模式再以更低价格招揽认股,出版计划被迫中止^④。从当年同文书局征求股印二书的启事可见,无论是“白纸本”《古今图书集成》或“开花纸”本《二十四史》,广告宣传时皆刻意标出购入价格,并强调为初印本、足本^⑤,以彰显其作为缩印底本之佳善稀罕。

①傅增湘:《涉园明本书目跋》:“《十七史》精印罕逢,余二十年前,见诸独山莫氏,乃为开化纸精妙之品,摩挲爱玩,手不忍释。今观涉园篋藏,即是书也。”作于民国二十年(1931)四月。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27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33页。

②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六十一岁”录胡祥鏊《浩授荣禄大夫徐公雨之先生六十征诗文启》,《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据民国十六年(1927)铅印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③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光绪八年壬午四十五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7页。

④参考沈俊平:《晚清同文书局的兴衰起落与经营方略》,《汉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281-282页。

⑤《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启》:“本局现以万馀金购得白纸者一部,用以缩印;又以六千金购得竹纸者一部,用以备校。”《同文书局石印廿四史启》云:“欲窥全史者非殿版不可,而殿版又非乾隆初印不可……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五百馀本。不敢私为已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印,较原版略缩,本数则仍其旧。”《申报》(上海版),光绪九年六月二十日(1883年7月15日),第3683号,第4版。

光绪十二、十三年,同文书局陆续推出石印《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渊鉴类函》等官修典籍,在上海《申报》刊登的销售广告,则是标榜所用底本皆为不惜重资购得的殿版“桃花纸”初印本,遂有丝毫不异的逼真效果。这不啻意味着彼时坊间或已形成某种共识,抑或出版者透过书业广告对社会大众灌输特定的阅读观念与消费印象,即“国朝善本之书,以殿板为最”^①,而殿版图书凡选用上好洁白纸张精印者,大多被当成传说中名贵的开化纸印本,倍获珍视。如此一来,“开化纸”之名便和“殿版白纸精印图书”的特定内涵高度系连,从而衍伸出种种和宫廷造办、皇室御用相关的珍奇意喻或华贵想象,成为世人普遍向往和追捧的名品。从追索如上的材料可见,自明中叶以来,递经长时间或不同地区人们的口传、耳闻、笔录、转抄等过程,“开化(花)纸”常被唤作或写成“桃花纸”,自在情理之中,也符合对美好事物的联想和形象转化。

开化纸印本的尊贵名声和观赏体验,不仅伴随着上海出版界新兴的影印技术引领品味风尚,也在北京琉璃厂书肆间风行久矣,每每成为好古者关注进而搜藏的对象。孙宝瑄曾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四日(1903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趋署哺出城,游于厂肆,观王石谷诸人山水。至翰文斋遇伍昭裔,见殿板开花纸印《御选唐诗》,极精。^②

《御选唐诗》刊成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大学士陈廷敬担任总阅,书法名家陈邦彦等人以软笔字缮写刻版^③,武英殿监造。书册尺寸适中,版面不画界栏;字体端秀、疏朗悦目。特别是全书句读以及笺注出典书名、人名另加外框,皆用朱色套印,颇便于诵读。孙宝瑄游厂肆所见者,当为殿版白纸初印本,纸张细薄匀洁,墨色明湛灿丽,套版精准不苟;摩挲翻览,兼有眼目肤触之娱,确实引人入胜。

宣统二年(1910)三月至十月,乐嘉藻^④赴北京旅游,经常流连于琉璃厂

①《钦定佩文韵府骈字类编两书定出转售告白》《石印渊鉴类函告白》,详见《申报》(上海版),光绪十二年五月七日(1886年6月8日)至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1887年8月18日)。

②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80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影印,第565页。孙宝瑄,字仲琦,浙江钱塘人。其兄孙宝琦曾任民国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岳父李瀚章曾任两广总督。孙氏治学,初好宋儒义理之学,后泛览史鉴,探究历代兴亡及典章制度之沿革变迁;又修习日文,广涉新译东瀛书籍,尤其注重政治哲学。

③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广陵书社,2007年,第18页。

④乐嘉藻,字彩澄,贵州省镇远府黄平州人,光绪十九年(1893)恩科举人,曾参与(转下页)

的古玩店与旧书铺;在近年刊布的游京日记中,不乏访购开化纸书的纪录。六月间,乐氏经常出入正文斋、求古斋等处,所见开化纸印本包括殿版《古文渊鉴》《四朝诗选》《十三经注疏》《佩文韵府》《全唐诗》《渊鉴类函》,以及顾氏秀野草堂刻《元诗选》等书。接连数日至正文斋观书议价,最后仅成交《古文渊鉴》一种;另于会文堂何培源处购得明晋藩本《宋文鉴》,并要求重新换面包角。日记有二处约略述及开化纸的称呼、材质、产地与特性:

六月十三日 正文谭掌柜亦呼开化纸为桃花纸。

六月二十七日 桂生言北京楮树最多,因议设由贵州雇匠人来京造白棉纸,当易销行。因取明印《宋文鉴》所用之白棉纸考之,贵州未尝不能造。又浙江开化纸,相其肌理及其韧性,亦是楮纸。其言设在北京造楮纸能及此两种纸者,当不愁无销路也。^①

显然,二十世纪初活动于北京琉璃厂的人们,已经习惯将开化纸、开花纸、桃花纸并用或混用,名称大同小异,实际上都是指向那种和武英殿版图书初印所用白纸具有同样肌理、韧性的绝佳纸张,并且认为所谓开化纸来自浙江,系以楮皮抄造。宣统元年(1909)浙江农工研究会创办之《农工杂志》刊载文章介述浙江特别之物产,即专列“开化名纸”一条,叙曰:

开化属衢州府,产纸最佳。纸质坚致耐久,色洁白而莹泽如玉,非若洋纸之纯白也。乾隆以前,发帑制造,所印□殿版书籍,均以开化纸者为更佳。南海李石农尚书,曾谓此纸之妙,不减于澄心及玉版。惜新者无从购求,京师旧家或有□者,价逾绫罗,庚子而后,更无存矣……(开化纸)纸质既耐久而色亦不变,□殿版书之最近者,亦二百年,而开卷如新,朱□灿然。同时所印之连四纸者,其色泽已迥不侔矣。今日开化纸槽,尚有存者,而所出类皆粗材,岂制法之失传耶?抑工料之不及也。^②

有关开化纸的名称、产地、原料、特性、用途、价值、制作时段等各种背景资讯,似乎逐渐形成一套清晰完整的概念或与版本收藏相关的基础常识,也作出似乎是目前考知首度有比较具体的赏鉴品评,且和洋纸之纯白色泽与清代内府刷印殿版图书所用的“连四纸”区别开来,认为彼此质地不能相提并论。至于乐嘉藻友人动念雇请贵州工匠来北京抄造出质量堪比白棉纸与开化纸的楮皮纸,则是从经商牟利的视角,反映出开化纸以其洁白、细腻、坚韧

(接上页)公车上书题名。戊戌政变后,以提倡新学为己任,曾自费赴日本考察学务。民国初年,曾任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管枢密院总务股事。著有《中国建筑史》三卷。

①以上详见乐嘉藻著,李芳、庞思纯整理,王尧礼校订:《乐嘉藻日记·庚戌旅行日记(之三)》,《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4期,第119-128页。

②《农工杂志》宣统元年第6期,第56-57页。

的优越特性,成为当时人们普遍喜爱和竞相收藏的对象,纸价或将因书价而看涨,正可为商品研制开辟一条前景大好的财路。

当然,真正以搜罗武英殿版图书建立个人独特藏书品味与文化招牌,甚且将“开化(花)纸”的名声推升至极者,非陶湘莫属。陶氏自光绪十五年(1889)迄至民国十六年(1927),近四十年间购得殿版书籍百余种;后应傅增湘之邀整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书,更充分发挥其雅善鉴识的眼力与醉心于明、清两代佳槧的热忱,陆续完成多部专题书目。民国二十五年,陶氏编成《清代殿板书目》并撰《清代殿板书始末记》冠首,道出殿版书于传统文化学术传承意义之外,最值得珍视者,正是刷印所用的纸张:

康、乾两朝百二十年间殿版之书,匪微卑视元、明,抑且跨越两宋……殿版书以开化纸印本为尤精美,予生平酷嗜之。吾友吴君眉孙尝戏予曰:“周鼎、商彝,世多赝造,若开化纸自乾隆以后不复制,而其技亦亡。后有巧工,无能为役,藏书家宜永宝之。”此虽谐言,中有至理……予购求殿版书,起光绪十五年己丑,迄民国十六年己巳,得百数十种。按代为次,编目以存。^①

陶湘仅仅以“精美”、“酷嗜”表述他对开化纸的赞叹和钟爱,另藉友人吴庠延续前文引述“乾隆以前,发帑制造”、“庚子而后,更无存矣”的说法,归纳为乾隆朝以后抄造开化纸的技艺工法俨然绝迹失传的臆解,衬托这种宫廷御用纸张的罕秘贵重与些许传奇色彩;除此之外,似乎再找不出陶湘对开化纸的评论意见或赏鉴心得。后人反倒更常从傅增湘笔下,得知陶湘于厂肆访书的风雅轶闻,进而想象开化纸何以令其痴迷的美感体验。

民国二十二年,傅增湘为陶湘编成之《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撰写长篇《题辞》,若与陶氏《清代殿板书始末记》合观,再搭配二编目录,恰如一部具体而微的清代殿版图书发展史纲。傅氏将当时故宫图书馆殿本书库贮藏群书,概分为写本、活字本、刻本三类;刻本又析出武英殿刻、扬州诗局刻与精巧别致的袖珍本。无论是缮写书法、摆印规模、雕版字体,皇家制作不同类型图书皆有独到的风格特色,而总归于如下几项共同元素:

其书咸端严雅丽,研妙辉光,纸幅选制,尤称精湛。开化纸洁如玉版,太史连色疑金粟。色香既古,装褙尤精。^②

①陶湘:《清代殿板书目》,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7-68页。点校本“十六年己巳”误作“十八年”,兹据“学苑汲古”网站检得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武进陶氏书目丛刊》民国间铅印本书影正之。

②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1辑第5册,据民国二十二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铅印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400页。

稍早于民国二十年四月,傅增湘也曾为陶湘所编《陶涉园藏明板书目》撰写《涉园明本书目跋》,兼述及陶氏藏书特色与轶事:

余与兰泉订交于三十年前,时方壮盛,即锐意以收书为事。其后南北驱驰,范围乃益廓。所收以明本、殿本、清初精刻为大宗,而尤喜官私初印开化纸之书,缘其纸洁如玉,墨凝如漆,怡目悦心,为有清一代所擅美。厂市贾人,遂锡以“陶开化”之名。^①

殿版书常见同一部书分别刷印白纸本与黄纸本,傅增湘特别推崇殿本用纸的工艺成就,认为白纸即开化纸,黄纸即太史连纸,形容开化纸之莹洁宛若驰名古今的玉版纸,太史连纸的色泽亦仿佛千年名纸“金粟山藏经纸”,皆能予人温润古雅的美好感受。傅增湘对开化纸纸色与质感的描述,固然未必具有开创性的总结意义,却最为后人知悉乐道;而陶湘因醉心搜藏开化纸初印本博得“陶开化”的雅号,自此传诵更广。民国二十四年(1935)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之陶湘小传,便承袭傅增湘的说法,同时让“陶开化”也成了“陶开花”:

武进陶兰泉湘,不重宋元本,所藏明闵氏套印本、汲古阁刻本、武英殿刻本,俱完全不缺……不问何类,凡开花纸所印,皆收之,一时有“陶开花”之称。^②

民国三十六、三十七年,时任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的周连宽以笔名“苦竹斋主”,在他所创立的《上海市立图书馆馆刊》连载《书林谈屑》一文,结合个人阅历与文献征考,记述近二年间徜徉上海、苏州书肆之丰富见闻。其中一节专门谈论古籍刻印纸张,对开化纸提出更多面向的描述,兼及和明、清两代其他白纸的比较。文曰:

清代印书,上焉者用开花纸,色白而坚韧细密,表面光滑,清康熙殿版《御制诗文集》及《性理精义》等书,即其一例。武进陶兰泉氏在世时,藏书甚富,陶氏最醉心于清初精刻初印之开花纸书,故世人常以“陶开花”呼之。嘉道间殿版书,多用白榜纸,较之开花,质松而稍厚,嘉庆《御制全史诗》及道光《钦定新疆识略》等书均用之……明刻用纸,亦分黄白两类,白纸复分白棉与白皮,白棉纸色纯白,质坚而厚,表面不如开花之光滑,白皮纸白中微带灰黄,颇似米色,不如白棉之细密,亮处照之,常见较粗之纤维,盘结于帘纹间。^③

①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27册,第327页。

②伦明等著,杨琥点校:《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③转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第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645页。

周氏所言,既有沿用旧说如“陶开花”之雅号,且独承《农工杂志》文章点出开化纸具有坚致耐久、洁白莹泽的绝佳质感,更多的是他寢淫书肆间与店家谈论书林掌故并且得以亲炙原书、手披目玩的实际体会。在此之前,陶湘只说殿版开化纸印本“精美”,傅增湘也只说开化纸“洁如玉版”,周连宽则进一步阐述开花纸除了颜色洁白,还具备纸张坚韧、质地细密、表面光滑等特征,他认为这正是开花纸有别于嘉庆、道光年间殿版常用白榜纸以及明版书所用白棉纸的辨识准据;榜纸松厚、棉纸坚厚,又皆差逊于开花纸之光滑。自此之后,洁白、坚韧、细密、光滑这四项特征共同撑起开化纸专属的品类内涵,不仅提升人们对纸质工艺的美感品味,也化作赏鉴古籍版本的知识和方法。这或许并非周连宽一人玩索独得的创见,而是反映当时学界与书业对开化纸的认知状态和理解程度。

直到周叔弢晚年为所藏清康熙秀野草堂刊《温飞卿诗集》撰写题识,被黄裳誉为“最简净的开化纸源流考”^①,才算是出现第一篇针对开化纸进行综合探讨的专题文字;尽管纯属个人偶然兴会之记,还来不及取得其他开化纸印本古籍细较比对,却对往后无论学术研究或收藏风气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与影响力。弢翁识云:

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化(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时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辨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数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印本以证之。一九八二年八月,叔弢记,时年九十有二。

弢翁所论,因个人收藏机缘而发,内容实乃史志、笔记以及陶湘、吴庠、傅增湘诸说之总汇;至如对开化纸“莹洁细润”、“抚不留手”的特征描述,大抵仍不出周连宽所揭四端,而读来更觉滋味丰足。这篇题识,几乎成为往后探索乃至验证开化纸相关问题的立论基础与品鉴指标。弢翁跋《温飞卿诗集》前后,曾在家书中数度询问长子周一良关于开花纸产地、原料与技术失传原因等事,并委托代查史籍中涉及榜纸、开花榜等名目的记载^②;1983年底因病

^①参考并转引自王传龙:《“开化纸”考辨》,第16页。

^②详见孟繁之:《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笺注》,《中国文化》2016年第43期,第303-320页。1981年6月14日、1981年6月29日、1983年11月27日各一通。

住院之前,仍惦念欲亲赴天津图书馆调阅开化纸书以印证其说^①,可惜未能如愿。

透过以上所述,我们看到无论是十九世纪末的上海出版界,又或二十世纪初的北京旧书业,开化(花)纸、桃花纸俨然成为宫廷出版图书精品的化身,不仅代表学术文化传承的权威感与正确性,同时更汇聚尊贵、富丽、雅致的美好意象,令人向往。不过,大部分对开化纸书的形容,仅止于精好,没有更多的细节描述或鉴赏品评,如同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述及礼部尚书延煦家藏图书,予人“精美绝伦”^②的印象。周连宽也许是第一位将他在上海、苏州坊肆听闻人们形容开花纸书的佳处,再综合亲身感受的心得体验归纳总结的学者,后来经过周叔弢铺展出更见历史纵深与敏锐生动的赏鉴文字,为古籍版本学界莫立有关开化纸的论述典范。

二、书目著录之抽样考察

开化纸书以其独特的纸质与精美的刷印效果广获读者藏家爱好,陶湘更以搜购殿版开化纸本而闻名,但《清代殿板书目》却不是一部单独著录开化纸印本的专题书目,仅能理解为陶湘极力网罗众多殿版图书,相对集中地展示有清一代内府开化纸印本的盛况;即便陶湘酷嗜开化纸,编订书目的主轴仍是时代与版本,纸质鉴识或纸别著录犹未被赋予独立或主导的角色。那么,众多使用开化纸印制的书籍,可曾在其他藏书目录中留下提供后人参据比对的线索?同一种书,开化纸印本与非开化纸印本又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化讯息?这些讯息如何反映藏书文化的脉动?

传统官、私藏书目鲜见注记纸别的体例,沈知方《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③是比较特殊的个案。沈知方系清嘉道间东南藏书家鸣野山房主人沈复灿后裔,曾任中华书局副局长;民国六年(1917)回到上海创办世界书局,事业鼎盛时,在中国文化界之地位几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驾齐驱^④。沈氏退出书店经营前,将个人自民国肇建后搜罗所得善本编成《粹芬阁珍藏善

①参考周珏良:《我父亲和书》,《文献》1984年第3期,第172页。

②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延尚书藏书极精,以殿本书、开花纸为要,其装潢精美绝伦。散出后,尝见之书肆。”《笔记小说大观》第33编第9册,台北新兴书局,1983年,第53页。

③严灵峰编:《书目类编》第39册,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17511-17674页。

④相关研究参见周李:《沈知方的出版理念及其践履》,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黄佳娜:《沈知方〈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研究》,云南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本书目》，尝自揭其求精不求多的藏书旨趣。《自序》曰：

生平别无嗜癖，惟雅好藏书：孤本精刊，尤为神往；往访搜罗，不遗余力……区区所好，不在繁浩，但求精雅。首重书品宽大，精刊初印；次则楮色古雅，如白棉桃花诸纸，亦时入选，否则均屏弃不顾。^①

可见沈氏藏书，看重书籍品相、刻印、纸张的精美雅观，赏鉴成分较高。为体现其藏书好尚，编订书目时设计一项特殊的体例，即于卷首分别制作经、史、子、集、丛五部统计表暨全部总计表，表内分“纸别”与“朝代”二项，核计藏书数（809）、卷数（22828）、册数（10297）。“纸别”包括白棉纸、桃花纸、白纸、太史纸、东洋纸、竹纸、钞本纸等7种；“朝代”在宋、元、明、清之下复罗列年号，而在“崇祯”与“顺治”之间单独插入“殿版”一类，乍看颇不协调，实乃表露藏书家服膺以殿版为“国朝”善本之冠的观念与心态。至于书目著录项目，除书名、卷数、册数、著者、版本、纸别、藏印等基本内容，部分书籍亦加注行格、序跋、批校甚至书品鉴赏文字。例如：

《七经孟子考文》 明旧钞本。书法精工无比。

《前汉书》 此是元时十行本。纸色古雅、印工精妙，经常熟孙潜夫以朱墨笔依宋本批校，每卷末有题记及校读时日，尚有蒋树之圈读。

《甌齔洞藁》（禁书）万历白棉纸精刊初印本。书品极宽大。^②

《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共著录“桃花纸”书24种、899卷、533册。兹列表1如下：

表1

书名	注记	数量
李氏易传	乾隆雅雨堂桃花纸精刊	8
河南聂氏三礼图	王氏信芳阁藏书 康熙桃花纸精刊初印本	4
五经图	炼溪王竑 雍正桃花纸精刊初印	6
春秋左传事类	谦牧堂藏书 通志堂桃花纸精印	5
篆文五经	桃花纸精刊初印	36
岳刻五经	殿版桃花纸	40
六书分类	全书朱墨笔细批 康熙桃花纸听松阁精刊初印	20
绎史	有筠圃审定、红药山房、周浩少冲、白岩草庐、读易楼藏书印 康熙桃花纸精刊初印	80
尚史	有于右任丁福保收藏印 乾隆精刊桃花纸初印	28

①严灵峰编：《书目类编》第39册，第17512页。

②严灵峰编：《书目类编》第39册，第17526、17603页。

(续表)

书名	注记	数量
宣和遗事前集	清初仿宋本重刊 桃花纸精刊初印	2
行水金鉴	宝应刘氏藏书 桃花纸精刊初印本	36
朱子全书	殿版桃花纸精印本	30
铁网珊瑚书画品	万历桃花纸精印 世间最罕见孤本 信芳阁藏书	12
历代题画诗类	有明善堂藏书印 康熙殿版桃花纸精刊初印本	32
删订通鉴感应录	康熙桃花纸精刊初印本	4
骈字类编	雍正桃花纸精刊	130
笠泽丛书	碧筠草堂桃花纸极初印本 全书朱墨笔细批校 有会稽李氏越缦堂藏书 慈铭李爱伯白华绛附阁等印章	2
笠泽丛书	海昌许珪桃花纸精刊极初印本 有昌平王氏草堂藏书印记 许珪珍赏印章	2
高青邱诗集注	文瑞楼桃花纸精刊极初印本	8
吕明德集	王氏信芳阁藏书 康熙桃花纸精刊初印本	6
云间二韩诗	康熙桃花纸精刊初印本 王氏信芳阁藏书 石秀斋集十卷附采隐草 小庵罗集六卷附拾香草	6
六朝文絮	桃花纸朱墨印本	2
历代咏物诗选	殿本桃花纸精印 书品阔大内府原订	32
雅趣藏书	康熙桃花纸朱墨刊印本	2

在这 24 部“桃花纸”古籍中,明标为殿版的仅有 4 部,《三礼图》《篆文五经》《绎史》与《骈字类编》亦出自内府,其余则皆为私家自刻,大多被标注为“初印”或“极初印”的本子,显然桃花纸并非专供皇室御用,民间精刊精印的书籍也能任意取择,以展现出版者对制作品质的要求。此外,沈氏收得一部王相“信芳阁”旧藏万历朝刊《铁网珊瑚》,认定为世间最罕见的桃花纸精印孤本,十分珍贵。这大概是目前所见书目著录明代使用开化纸、桃花纸印书时间最早的一例,且纸张质感绝对不在雍正、乾隆朝殿版之下,惜乎如今已无缘得见真容。

私家藏书目录注记纸别或兼及书品赏鉴,目的在于展示个人珍藏质量,及其对精雅美好的品味追求,实非常态,亦不成定例。然而,编目的需求情境或实用导向,一旦转为宣传牟利的商业经营模式,其体例内容势必出现明显而有趣的变化。也许对编者和读者来说,书籍品相和版本优劣仍是翻检寻索的重点,但价格绝对是支配购买意愿或评估营业收益的要角,而影响售价的因素,正是纸张和其他穿梭于簿录条目间的注记文字,诸如品相、装潢、印记、批校、题跋等,各自发挥吸引消费者关注的功能。部分清末民初的公、

私营业书目,清楚反映着这种变化^①。我们同样可以藉助营业书目,从更贴近生活脉动的角度,尝试捕捉开化纸印本在书籍市场上流通的片段讯息,看看哪些书是坊贾和藏家认知中的开化纸印本?开化纸印本和其他纸张印本价差几何?这些丰富的材料,一方面作为我们考校书目著录、文献记载与传存实物三者之间是否得以相互验证的参照基础,再则有助于了解刷印纸张在古籍商品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民国十四年(1925),北京隆福寺街的“文奎堂”书庄,分别于四月、八月以石印、铅印发行《文奎堂书目》^②。书目仅著录书名、版本(极简略)、纸别、数量,不标售价,卷首启事云:

各种书籍,板本、镌刻、纸张,先后优劣,多有不同,其价目参差,势难固定。故价目一项,只好付之缺如。倘蒙赐顾本庄,当按照行市价值,格外从廉。

这种做法,不啻保留一定的议价空间,也意味着顾客要能在版本、镌刻、纸张等方面具备与书庄掌事者相当的识见,才有更多机会争取到较实惠的价格。书目所载纸张包括:竹纸、白纸、(白)洋纸、白棉纸、棉纸、开花(棉)纸、(白)宣纸、皮纸、木板竹(白)纸、高丽纸、罗女纸^③等十数种。编目者对纸张的区别原则颇明确,棉纸或白棉纸印本皆为明刊本或抄本,亦有一部元版《通志》;洋纸皆为铅印或石印本;皮纸、高丽纸皆属朝鲜或日本刊本;宣纸、白宣纸是金陵书局或自刻本所用。此目著录的开花纸印本共有19部^④,另有一部康熙朝拳石堂刊《抚苗录》,记为“开花棉”;仅观其纸色洁白与普遍带有黄褐斑点的特征^⑤,和其他常见之开化纸印本几无分别。这些著录为开花纸刷印的古籍,除《汉隶字源》为明末汲古阁所刻,其余大多是清代内府或武英殿

①例如《浙江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书目》开列同一种书不同印纸的售价,由高至低大概是:连史纸、官堆纸、赛连纸、顺太纸;再如《湖北官书处书目》依序是:贵皮纸、白宣纸、竹连纸、官堆纸、赛连纸、十则纸。参考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②严灵峰编:《书目类编》第45册,第19817-20186页。

③独见张钧衡刻《择是居丛书》所用。或应为“罗文纸”,“文”误为“女”。

④包括:《汉隶字源》《清字通鉴纲目》、殿板《御纂性理精义》、《康熙御制文初二三集》《钦定全唐文》《御选唐诗》《古文约选》《御制全韵诗》《南巡盛典》《朱批谕旨》《五朝圣训》《平定准噶尔方略》《皇清开国方略》《钦定热河志》、康熙刊《河南通志》、《古文渊鉴》《满文日讲四书》《满文小学》《满文性理精义》。

⑤此书写刻甚精,传本亦不多,目前已知仅傅斯年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六家有藏。哈佛燕京全文影像:[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4329954\\$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4329954$1i)。

刻印的代表性图书。

清光绪年间,曾任浙江宁绍道员的吴引孙以四十万两银于扬州北河购地三十亩、聘请浙省工匠兴修宅第,当中仿宁波范氏“天一阁”形制辟建“测海楼”以藏书、读书。吴氏藏书宏富、不拘一格,光绪三十年(1904)编订《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十二卷时,总量高达 8020 种、247759 卷,与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并称海内搜买古书四大家^①,为清季东南地区最具规模的民间藏书楼。民国十九年(1930)初,“久为举国所企羨”^②的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 589 箱,以 3 万元售予北平书贾王富晋;翌年十一月,王氏再编《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③七卷石印发行,作为公开販售测海楼旧藏的商业书目。王氏书目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纸质、数量、售价,兼及传藏、禁毁、批校题跋等个别特色注记,极少数书籍甚且注明装帧样式^④,讯息多元丰富。

单就“纸质”而言,吴引孙书目宣统二年刊本仅针对特别精善珍稀的书籍加注纸别,例如卷一著录《御纂周易折中》,小字注:“康熙朝/桃花纸原刊本。”民国二十年富晋书社书目则是将每一部书都标记纸质,作为订价参考;其品目众多,包括:桃花纸、竹纸、白纸、宣纸、黄纸、开花(化)纸、太史(泗)连纸、开花榜纸、毛边纸、毛太纸、赛连纸、洋纸、(白)棉纸、黑白棉纸、皮纸、美浓纸、粉纸、贵州棉纸、有光纸、边纸、东洋皮纸、麻沙纸、夹贡纸、黑棉纸、白宣纸、杭连纸、棉料纸等近 30 种,以白纸、竹纸为最大宗。书目中著录为“桃花纸”、“开花(化)纸”、“开花(化)榜纸”刷印者共 30 种,兹列表 2 如下:

表 2

书名	版本 纸质	数量	售价
御纂周易折中	康熙朝殿版桃花纸初印	10 本 1 函	洋 130 元
钦定四书文	乾隆朝刊开花纸	24 本 2 函	洋 50 元

①吴引孙:《测海楼书目自序》,转引自严灵峰编:《书目类编》第 38 册,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王富晋排印本影印,第 16924-16926 页。另参考唐丹丽:《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研究》,扬州大学 2016 年硕士论文。

②《上海北平富晋书社扬州吴氏测海楼书目出版》,《申报》(上海版),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第 21071 号,第 5 版。

③转引自严灵峰编:《书目类编》第 37 册,据民国二十年北平富晋书社石印本影印,第 16095-16658 页。

④例如《钦定渊鉴类函》又一部注曰:“点石斋石印,横行绸子皮,古雅。”《盐铁论》注曰:“绸子书面,两锦套。”严灵峰编:《书目类编》第 37 册,第 16106、16399 页。

(续表)

书名	版本 纸质	数量	售价
朱批谕旨 又一部	雍正朝 殿版桃花纸最初印本 全上 殿版桃花纸精印	112 本 18 函	洋 160 元 洋 130 元
钦定大清通礼	殿版开花榜纸初印宽大	8 本	洋 65 元
御制全史诗	嘉庆朝内府刊本开花纸初印	64 本 4 函	洋 150 元
皇朝礼器图式	乾隆朝福隆安等奉敕撰 武英殿本 开花纸初印	16 本 1 函	洋 280 元
御制乐善堂集	乾隆朝 殿本开花纸初印	8 本 1 函	洋 60 元
御题听松庵竹炉 图咏	乾隆朝 原刊开花纸	1 本	洋 16 元
御题竹炉图咏	乾隆朝 原刊开花纸	1 本	洋 6 元
御选古文渊鉴	殿版开花纸初印	24 本 2 函	洋 130 元
仪礼郑注	道光甲午立本斋刊本开花纸初印	4 本 1 函	—
古今释疑	康熙年刻本开花榜纸最初印	12 本	洋 150 元
铜板诗韵合璧	咸丰年间刊开花纸印	2 本 1 函	洋 30 元
汉隶字源	明汲古阁刊开花纸初印	6 本	洋 130 元
古香斋纲目三编	乾隆年刊开化纸	8 本 1 函	洋 24 元
春明梦馀录	古香斋本开化纸	24 本 2 函	洋 80 元
河东宣化录 督 豫宣化录 总督 东河宣化录	开花纸印	12 本 1 函	洋 140 元
山东通志	康熙十三年辽东开花纸初印	40 本	洋 240 元
命度盘说	道光癸未心远堂刊本开化榜纸初印	3 本 1 函	洋 40 元
类类联珠	同治年刊开花纸最薄	4 本 1 函	洋 10 元
御制日知荟说	乾隆元年皇上取旧制各体文亲为删 择勒成一编内府刊本开花纸最初印	1 套 4 本	洋 50 元
圣谕像解	康熙二十年梁氏承宣堂刊本开花纸 初印	20 本 2 函	洋 100 元
御制蒙汉劝善 要言	顺治十二年内府刊本开花榜纸初印 黄绫皮	1 本一黄绫函	洋 15 元
心知堂诗稿	道光年精刊开花纸初印	8 本 1 函	洋 120 元
睫巢集	原刊本开花纸初印	1 本 1 函	洋 35 元

(续表)

书名	版本 纸质	数量	售价
石松堂集	康熙年刊开花纸初印	8 本 1 函	洋 35 元
醉愚堂集	雍正年原刊开花纸初印	4 本 1 函	洋 100 元
金兰集	乾隆年刊开花纸初印	4 本 1 函	洋 36 元
湖山灵秀集	康熙年刊开花纸初印	4 本 1 函	洋 100 元
记红集	康熙年刊开花纸初印	2 本 1 函	洋 130 元

类似这样的注记方式,反映出编目者不仅具备鉴别各种纸张的常识和经验,也有精准传达审度书品的眼力。这既是为了挑起顾客探询的好奇心甚或购买欲望,也在彰显店家存货的质量,塑造并维护其专业、公道的经营形象。在这批测海楼旧藏的开花纸本书籍中,除了仍然可见汲古阁《汉隶字源》和世人熟知的殿版图书外,更加入许多道光、咸丰、同治时期以及民间刊刻被认定为开花纸刷印的书籍,且不乏独具特色者,例如同治朝刊《类类联珠》使用“最薄”开花纸刷印,确实稀见。

营业书目详记纸别,诚因纸张乃影响古旧书籍价格的要素之一。订定书价须斟酌诸多条件,但大抵仍遵循着某种稳定的运作模式,版印先后与纸张质地,可谓其中最关键的二项。就版印先后而言,愈先印成的初印本价格愈高;就纸张质地而言,白纸印本普遍较黄纸(竹纸)为贵,而开化纸本的售价又在一般白纸本之上。以下试举几部古旧书店营业书目所载资讯为例^①,简单说明印次、纸别之于书价的作用力和差异性。

其一,纸张相同,初印贵于后印。例如:前引《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著录二部桃花纸印《朱批谕旨》,最初印本要比精印本多出逾 2 成价格。民国二十六年(1937)《邃雅斋书目》著录有六部开花纸印《周易折中》,记为“宽大初印干净”一部 60 元,记为“初印”一部 55 元,其余四部印次稍晚的开花纸本则从 20 元至 50 元不等。民国三十年(1941)《来熏阁书目》第六期上编著录康熙殿版竹纸印《渊鉴类函》,初印本定价 300 元,后印本仅 100 元。

①限于时间与篇幅,本文仅以翻检窦水勇编《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古书价格》(线装书局,2004 年)所收各书目为例说明,亦不再另增注释逐一说明出处。其他同类型文献,尚可参阅窦水勇编《江南旧书店古书价格目录》(广陵书社,2005 年),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韦力主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补编》(线装书局,2006 年),殷梦霞、李莎莎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诸编所收录多种书局书目。

其二,白纸印本价格普遍较竹纸印本高。例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松筠阁书目》第一期著录明闵刻朱墨套印《檀弓》,棉纸本8元,竹纸本5元。北平直隶书局《民国二十年春季新旧书目录》著录傅世珪《六书分类》,白纸初印本洋30元,白纸本洋26元,竹纸本洋12元。《来熏阁书目》第六期上编著录光绪刊王先谦《汉书补注》,白纸本80元,竹纸本75元。不过,只要是初印本,纸张势必退居次要考量,例如陈廷敬《午亭文编》康熙原刻,竹纸初印本60元,白纸本则为40元。

其三,开化纸印本和白纸印本的价格差异。若某书有开化纸初印本,比起普通白纸印本或后印本,书价可高出约10倍。例如:《民国二十年春季新旧书目录》著录《诗经传说汇纂》,开花纸初印本洋100元,白纸本洋7.5元;殿版《大清会典》,开花纸印本洋150元,白纸印本洋16元。又若二种纸别皆为初印本或刷印时间相近,价差约在5倍左右。例如:民国二十六年《文奎堂书目》第11期著录张氏泽存堂刊《玉篇》、《广韵》,开花纸本100元,白纸本20元;康熙朝初印《芥子园画传初集》,开花纸本80元,白纸本15元。

其四,开化纸印本和竹纸印本的价格差异。开化纸印本价格约是竹纸初印本的2至6倍。例如:《民国二十年春季新旧书目录》著录殿版《佩文韵府》,开花纸本洋400元,竹纸初印本洋100元。《来熏阁书目》第六期上编著录康熙殿版《朱子全书》,开花纸本300元,竹纸初印本80元。《邃雅斋书目》著录殿版初印《佩文斋广群芳谱》,开花纸本140元,竹纸本60元;殿版《渊鉴类函》,开花纸本600元,竹纸初印本280元;殿版初印《御选唐诗》,原装开花纸本120元,竹纸本50元;雍正年刊《唐诗金粉》,开花纸本40元,竹纸本7元。

其五,开化纸、白纸、竹纸印本并列的价格差异。直隶书局《民国二十年春季新旧书目录》著录殿版《书经传说汇纂》,同时备有三种纸张的印本待售。其中,开花纸本记为“初印”,要价洋100元;白纸本洋10元,竹纸本洋5元,或许皆为较晚之印本,可以推测其纸张、印工势必远远不及开花纸初印之精丽,价差倍数也更见悬殊。

仅从以上所列举有限的书目著录资料,或可约略看出民国初期流通于古旧书市场的开化纸书,虽然仍是以康、雍、乾三朝殿版为大宗,却也偶见少数价格不菲的明版书籍^①,另外就是出现许多道、咸以降出版者,且不乏稀罕的珍品。这似乎已经在某种程度改写了前述陶湘引用吴庠所谓“开化纸

^①除了汲古阁刊《汉隶字源》,《邃雅斋书目》亦著录有明天启刊张介宾《类经》,开花纸,36册标价260元;明刊钟离栖筠子《牌统孚玉》,当即明崇祯十三年(1640)胡氏十竹斋刻本,开花纸原装,2册要价60元。

自乾隆以后不复制,而其技亦亡”以及周叔弢接着提出“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的观察推论,更贴近图书出版生态与民间阅读风气的实际脉动。此外,藉由开化纸本与非开化纸本的书价比较,明显察觉在书店架桶间弥漫着一股“书因纸贵”的氛围;或许若干原非以开化纸刷印的白纸精印书籍,只要品相尚佳,也有可能被卖家标上“开花”、“桃花”的标签谋取高价。这些在书目中标榜者精刊、初印或原装的开花纸、桃花纸古籍,有许多至今仍可连结到具备同样书品条件的存世实物;然而,一旦试图从书籍追溯、对应到相关的档案文献,便立即出现无法跨越的障碍,没有任何一部书可以被证明确实是用开化纸印制。面对这种言之凿凿却又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不免令人起疑:难道所谓的开化纸印本,真的只是讹传?甚至是坊肆贾人为了暴利而特意哄抬炒作的商品噱头?

三、从文献到实物的断裂

前文提到明末毛氏汲古阁校刻《十七史》有桃花纸初印本,精好醒目,令人印象深刻;民国时期营业书目不只一次著录汲古阁刻《汉隶字源》有开花纸初印本,亦曾同时并列白纸本与开花纸本,二者价差6倍^①。可见汲古阁刊印书籍,确实有用较诸一般白纸品级更高、质地更精良的纸张制作初印本。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两部《汉隶字源》为例,视其纸色字迹,当即白纸后印之本;另有两部汲古阁大字重刻《说文解字》,同为白纸,初印本纸张柔软细致,后印本用纸虽也不差,抚触匀滑则略逊一筹。倘若就以这部《说文解字》初印本作为吾人想象或认识汲古阁印书所用桃(开)花纸的参据样本,似无可。然而,院藏一帙明万历年间内府所刊《书经直解》,部分页面经过补刻,整体刷印时间稍晚,纸质特征类似汲古阁初印《说文解字》而微感粗糙,也十分接近世人公认的清代殿版开化纸印本;黄绫函套内留有二张旧签条,其中一张年代较早者写有“书经直解 清水连四”。这说明最接近人们期待或想象中的开化纸印本古籍,在明、清内府经手点检的前人眼中,这样的印书纸张自有专属名号,叫做“清水连四纸”。

康熙皇帝所撰《御制诗文集》,向来被奉为清代前期“殿版”、“开花纸书”之精品。究其实,皆属臣工自行出资在外地刊刻、刷印后上呈内府,既是进献君王的礼物,同时也成为君王再行颁赏的恩赐,使得这些书籍承载并传递着特殊的政治权力内涵。康熙《御制诗集》《二集》,乃江宁巡抚宋荦承刻

^①民国二十六年重订《文奎堂书目》第11期卷一《经部·小学类》著录该书“白纸六本,十元”、“开花纸六本,六十元”(宴水勇编:《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古价格目录》第3册,第2370页)。

于苏州。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宋荦奏报诗集印刷装订完竣,准备连同书板一并进呈,皇帝谕曰:“诗集多印刷些进来,板不必进呈,交与苏州织造处收着。”^①同年八月,宋荦另奏诗集印制进呈数量:

《御制诗集》于未奉旨之先,已用棉纸印就三百部;今遵旨又用竹纸刷印二百部,一并装订完备,贮二十三箱,交织造臣李煦家人恭进。现用竹纸再印五百部,另行进呈。^②

后人看来莹洁如玉的开花纸,宋荦仅叙明为“棉纸”,即以300部白纸印本与700部黄纸(竹纸)印本对举,符合皇帝旨意和官方印制图书的基本模式。

至于康熙《御制文集》《二集》《三集》,乃编修蒋涟承刻,康熙五十三年(1714)进呈。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一帙,刻印精丽,墨色明湛,纸张洁白、薄透匀润、微见帘纹。各册覆以明黄地团龙纹暗花缎书衣,贴牙色绢书签,明黄绢包角,杉木板明黄地暗花缎面四合函套装盛,贴明黄缎套签,属于最典型的宫廷陈设本装潢規制。与《御制诗集》相较,二书印纸质地皆属洁白细密,《御制诗集》纸张略厚而帘纹愈不明显,同为人们心目中标准的清代内府开化纸印本。不过,首册内夹附一张高11.1公分、宽8.2公分的白纸签条,记曰:

《御制文集》共三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编修蒋涟刊进,俱系散篇。今装订三套二十二本。连四纸。

可见蒋涟进呈时,并未将全部文集装订成册;御集呈进后,始由大内按宫廷陈设規制装潢,夹签应是作业人员注记工作概要以示负责的凭证,而当时经手装订或承办工作的工匠臣僚一致称呼这种规格、质感的纸张为“连四纸”。

同样的白纸签条,亦见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一部《御选历代诗馀》中;此书曾在民国二十六年印行之《邃雅斋书目》载有一部康熙殿板开花纸初印本,标榜其书品干净且为原装,售价是另一部竹纸印本的十馀倍^③。院藏本共三函十八册,明黄地凤鸟纹暗花缎书衣,黄绢包角,明黄地团龙寿字纹仿宋锦套,牙黄色书签、套签,墨笔题签“御选历代诗馀”并卷(函)次,装帧典雅美观。纸色洁白,几乎不见帘纹,多处泛出黄褐色斑点,是人们印象中熟悉的开花纸特征。持与前述康熙御制诗文集相较,纸质厚薄极似《御制诗集》;全部书页正反面虽然都经过研光,犹不及《御制文集》来得柔软平滑。书中夹附签条记曰:

①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宫中档奏折(以下简称“宫中档”),统一编号:故宫 002426。

②宫中档,统一编号:故宫 002428、故宫 002430。

③《邃雅斋书目·集部·词曲类》著录该书“开花纸48册,700元”、“竹纸32册,60元”(窦水勇编:《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古书价格》第3册,第2182-2183页)。

《御选历代诗余》原六套四十八本,四十八年正月十三日畅春园发下研过改三套十八本。系翰林王佚清进。棉纸。

我们完全无法推想先后留下这两张白纸签条的工匠,对鉴别纸张种类是否有相对熟练的经验或一致的标准,但不难察觉近百年间世人公认最具代表性的开化(花)纸印本,倘若还原到刻印当时的情境,大多只叫“棉纸”或“连四纸”。

康熙年间奉敕纂辑、雍正朝竣工的武英殿铜活字排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有白纸印本与黄纸印本,向来被认为白纸即开花纸,黄纸即竹纸^①。民国初期“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紫禁城文物时,曾明言乾清宫陈设一部为“开花纸”印本。《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载乾清宫正殿“天”字第二四号“图书集成 五百二十函”,注曰:

共计五千〇十一册,殿版开花纸带红木匣。匣内有二夹板,第一函第一册目录中夹一纸条,上书“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洋人拿去《钦定图书集成目录》一本三四函”。^②

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遂沿袭此说著录:

《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按文渊阁藏一部(太史连纸),完全无阙。乾清宫藏一部(开花纸),内阙一册,有夹签(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洋人拿去一本,即联军入京时事)。皇极殿藏一部(开花纸,内有钞配数十篇亦完全者),又一部(太史连纸,钤静寄山庄玺,缺《职方典》卷八百二十一之二十二两卷,计一册),今皆移贮本库。^③

文渊阁太史连纸本,乾清宫、皇极殿开花纸本,现皆典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部陈设本用纸有别,装潢材质样式亦各不相同:文渊阁本(黄纸)用明黄绢书衣、包背装、楸木函匣;乾清宫本(白纸)用明黄洒金笺书衣、牙色绢书签、黄绢包角线装、红木函匣;皇极殿本(白纸)用石青绢书衣、白纸书签、黄云龙纹缎包角线装、楸木夹板,板面刻书名、部类、函次,字面填石青。就纸张保存状况而言,黄纸本色泽匀洁,少有霉污色斑;白纸本纸张净白薄细,页面常见黄褐色斑点,多则连绵满布,大大影响阅读时的视觉感受。

为求得更直接确切的文献佐证,进一步爬梳清宫官书档案史料,竟无一

①参考杨居让:《馆藏善本探秘之一:〈古今图书集成〉之用纸》,《当代图书馆》2007年第91期,第11-13页。文中征引各家言及《古今图书集成》刷印纸张的说法。

②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1编第1册,《乾清宫》卷一,《乾清宫正殿》,第1页,民国十四年排印本。

③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1辑第5册,第655页。

处记载白纸排印之《古今图书集成》为开花纸本,皆称作“绵纸”或“连四纸”。《雍正朝起居注册》载: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己亥,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果亲王允礼等奉谕:《古今图书集成》棉纸书十九部,一部供奉寿皇殿;其余九部,交乾清官总管,于应陈设之处陈设;其余九部,赏怡亲王……每人一部。竹纸书四十五部内,赏诚亲王……每人一部,其余三十部收储。^①

《乾隆朝上谕档》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1763年8月22日)载:

查据武英殿现存未装订《古今图书集成》棉纸书三部,竹纸书二十四部,谨奏。^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藏清宫内务府奏销档,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五日(1775年6月12日)金简《奏为热河文津阁陈设古今图书集成装潢事》:

装潢此书壳面,文津、文源、文渊三阁共需用香色素绉四百九十四疋,前经奏准,发交杭州织造处办造送用……查武英殿现存《古今图书集成》书五部,内竹纸书四部,连四纸书一部。此一部系鄂尔泰家交回之书,残缺八十餘本,虽经奏明补写齐全,但书内原有虫蛀之处难以陈设。现今装潢三阁陈设,应请统用竹纸书三部……再装潢《四库全书》套匣繁多,前经奴才奏准,概用楸木成做,《古今图书集成》套匣亦应一律用成做之处,合并声明……本日奉旨:知道了。匣套即照依《古今图书集成》书本大小成造,上下夹书板不必用绉糊饰,插盖应刻书名,字样着填泥金,钦此。^③

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区辨《古今图书集成》刷印纸张的观念,多认为黄纸即竹料,白纸即棉料,故常以“竹纸”与“棉纸”相称;倘若使用更具体的纸品名称,则是将这种等级规格和质地特性的白纸叫作“连四纸”。

雍正十年(1732)宣付南熏殿上谕馆剞劂、乾隆四年全部刊印竣事^④的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070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4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253页。

③奏销档,档号:05-0319-067。另可参考项旋:《古今图书集成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第123-129页。

④根据乾隆四年六月二十八日(1739年8月2日)沈蔚奏报:“谨查南熏殿上谕馆自雍正十年十月二十日奉世宗宪皇帝谕旨:‘南熏殿改为上谕馆,刊刻朱批谕旨。钦此,钦遵。’即于十一月十八日开馆……今刷印折配之书,于本月俱已告竣……所有刊刻字板,交与武英殿收贮。”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以下简称“明清档案”),登录号:145129-001,“总管内务府为刊刻朱批谕旨事”。

《朱批谕旨》，在前引民国十四年《文奎堂书目》与富晋书社《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中，皆著录有开花纸、桃花纸印本。全书共 18 函、112 册，宋体字写刻，采朱、墨双色套印，技艺精湛，版框四周边角几乎看不出有套版定位的记号痕迹，犹能达到行格、圈点毫厘不失的准确度；若为最初印本，其纸张洁白细腻、墨色明丽饱满，诚属插架度藏之珍品。乾隆四年六月间，监察御史沈嵒具折奏报最近 1 年 11 个月上谕馆为刻印《朱批谕旨》动用的所有钱粮开销数目，详细列出包括雇用缮写、刻字、刷印、装订、黏签、折配齐钉、裁书、锯板等各种工匠的工资，以及采购木板、纸张、笔墨、颜料，并搭建作房、饭食差旅等等所需经费。从奏折内容可以明确知道，印制《朱批谕旨》耗用最多的二种纸张，是“太史连纸”与“连史纸”：

共用过太史连纸五十九刀十七张，内除旧存太史连纸四十六刀七十三张，买太史连纸十二刀二十张；每刀价银六分，用银七钱二分。共用过连史纸五百八十三篓十刀二十七张，内除旧存连史纸一篓六刀七十二张四页，买连史纸五百八十二篓；每篓价银八两四钱，用银四千八百八十八两八钱。^①

二者数量差距悬殊，据以推断《朱批谕旨》当即选用连史纸刷印而成。奏折将纸名记作“连史”，或许一如“开化”与“开花”，乃因口语声调变异造成写录文字不同，其实正是“连四”纸。民国初年，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尝特立“连史纸”一条，指出这种纸张色白、质细，其名“实连四之讹”^②，可为佐证。

2014 年，故宫博物院与一档合作编辑出版《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囊括目前所能收集到武英殿修书处以及与之相关的御书处、内务府、内阁相关档案，为学界提供研究清代内府图书出版制度并且可与现存书籍相核互证的第一手材料，其价值与贡献不言可喻。根据此书首册收录之《嘉庆元年至十三年奏事档》，记载近 30 种武英殿奏陈刊印书籍的办理情形，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当时书籍制作、装潢、陈设、赏赐的相关程序和具体做法，亦有助于勾勒出清一代至少在嘉庆朝前期宫廷图书出版活动的制度规范与操作模式。兹举数例如下：

（一）《钦定兰州纪略》

嘉庆三年三月初四日，武英殿谨奏：前经方略馆移送《钦定兰州纪略》副本一部，交武英殿缮写刊刻，今已刊刻刷印完竣。谨装潢杉木板石青杭细套、石青杭细面页、连四纸样本书一部一套八本，恭呈御览。

^①明清档案，登录号：179180-001，“总管内务府为奏销钱粮事”。

^②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1986 年，第 6018 页。

其应行带往盛京恭贮之二部,仍照例带往。至刷印若干部,作何装潢,另缮清单,伏候训示遵行。谨奏。

本日奉旨:知道了。书交懋勤殿。钦此。

本日又奉旨:《兰州纪略》白纸书仍着刷印装潢二十部。钦此。

奉朱批:杉木板石青杭细套、石青杭细面页、连四纸书二十五部,纸合背蓝布套、古色纸面页、竹纸书五十部。^①

嘉庆四年十二月初四日(1799年12月29日),武英殿奏报前述书籍全数刷印装潢完竣,再奉旨:

连四纸书二十部,交懋勤殿拟处陈设;竹纸书五十部,交军机处拟赏。钦此。^②

(二)《钦定满州源流考》

嘉庆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武英殿谨奏:前经方略馆移送《钦定满洲源流考》副本一部,交武英殿缮写刊刻,今已刊刻刷印完竣。谨装潢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页、连四纸样本书一部一套八本,恭呈御览。其应行带往盛京恭贮之二部,仍照例带往。至刷印若干部,作何装潢,另缮清单,伏候训示遵行。谨奏。

陈设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页、连四纸书二十部;

赏用纸合背黄绢套、黄笺纸面页、竹纸书二十部。^③

嘉庆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01年5月5日),武英殿奏报呈进样本书内遭皇帝指出的四处错字已校改完竣,再呈御览。翌年十一月六日(1802年11月30日),陈设、装潢书各20部皆遵旨刷印装潢完竣,武英殿再奏请依照往例将连四纸书交懋勤殿拟处陈设,竹纸书交军机处拟赏^④。

(三)《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

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由军机处交出清文御制《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一本,着以原文上样刊刻。又汉文底本一折,着本处照式缮写刊合钉一册,照例刷印装潢进呈。^⑤

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长庆交《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连四纸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页一部一套,余二十九部尚未装潢,得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1册,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276-277页。

②《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1册,第304-306页。

③《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1册,第334-336页。

④《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1册,第342、380页。

⑤《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1册,第425页。

俟得时拟处陈设共三十部。

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奏事处首领王进福交《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榜纸黄杭细合背套纸面页拟赏人用十九部。^①

藉由以上所举书例,不难归纳出若干原则或规律:其一,奉敕纂办的各种书籍若交由武英殿刊印,修书处会先刻制样本书进呈御览,同时另将两部最初刻初印本送往盛京皇宫贮藏;样书经皇帝审阅、校订无误,修书处即请旨谕示刷印数量暨装潢款式。其二,进呈样本与陈设本皆以连四纸刷印,赏用本则选用竹纸或榜纸刷印。其三,书籍装潢規制,进呈样本全用杉木板黄绫函套、黄绫书衣;陈设本函套以杉木板裱覆黄绫或石青杭细,书衣亦用黄绫或石青杭细;赏用本函套以纸板包蓝布或黄绢,书衣则用古色或黄色笺纸,透过不同的材质、颜色区分尊卑等第,严禁逾越躐等。其四,书籍装潢完成,分别由懋勤殿与军机处拟单开列应该陈设的宫殿处所与赏用对象,呈请皇帝批准后,即照单陈设、颁赏。在这样一套设计周详、运行有序的制度规范里,纸色洁白的书籍通常代表着权力位阶较高的进呈本或陈设本,其印制数量相对较少,装潢款式也更华丽体面。只不过,和这套制度直接扣合的白纸,名称并非“开化(花)纸”,而是“棉纸”或“连四纸”。

四、开化纸印书史料钩沉

从清末以来学人记述的文献踪迹中,我们观察到开化纸印本古籍广受访书、观书、购书、藏书之人一致赞叹;从民国初期私藏与营业书目的著录中,我们探寻着开化纸印本古籍倍获珍视以及书因纸而贵的清晰脉络。然而,若想再从文字记载跨进到那些世人公认、名头响亮、印造精美的典型开化纸印本古籍,试图相互系联验证,以坐实“某书确为开化纸所印”的说法有其能够回溯检核的脉络条理,便会出现明显的断裂、空白。那么,有清一代内府是否真正出现过“开化纸”这般纸张名目?开化纸可曾实际用于刷印内府纂修的书籍?又若真有清代内府开化纸印本书籍,如今可还有能够印证存世实物的线索?面对这些疑问,仅就目前查考知见的档案史料与文物传藏现况,皆有确证得以答复为“是”。

清雍正八年(1730),朝廷派员外出查访各种官方办买物料的时价行情,并与雍正元年六部九卿统行议定的现行条例相核较,重新划一物价求其均平无浮克,以为日后各部采购商品的标准定价。乾隆元年(1736),大学士迈柱将这份重新议定的清册汇编为《九卿议定物料价值》四卷进呈御览,后由工部刊印,并通行各部院衙门及八旗、顺天府一体遵照;这是清代官方颁定

^①《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1册,第435-437页。

的第一部物料价值专书^①。全书罗列近三千种物品,从工程材料到生活日用皆有定例、定价。卷二《纸张》一项载有:

各色开花连肆纸每张照旧例
今核定银壹分

乍看之下,颇令人好奇:所谓“开花连肆”系指某个连肆纸类的品项,有不同规格样式可供选择且价钱相同?抑或这一项同时含括“各色开花纸”与“各色连肆纸”?倘若将书中所有纸张名称、定价罗列并观(如下表3所示)^②,或可约略揣摩出某些命名分类的规律,例如“呈文纸”类有:大白棉料呈文纸、山东呈文纸、白棉料呈文纸、黄西呈文纸、各色呈文纸、山西呈文纸;“笺纸”类有:黄龙笺纸、黄金笺纸、各色笺纸、香色小笺纸。同为“连肆纸”类,尚有:棉料连肆、竹料连肆、各色连肆;那么,“各色开花连肆纸”应仍为一种纸品而非同时含括开花纸与连肆纸这二种纸张。至于“开花”意谓纸张带有不同图案、纹路、染色,抑或与“开化”音近而写作“花”字,已不得确考。此外,这类纸张的价格,若和这部书所登载全部纸品价格相较,属于中等价位,与山东呈文纸、各色毛边纸、各色榜纸同为每张壹分银;再与其他物料价值相比对,一张长约四尺、宽约二尺^③的开花连肆整纸尚且与茶钟、小菜碟、白瓷碗、鼓捶、胭脂等物品等值,也还不算寻常百姓有条件大量采买、常态使用的纸张品项。

表 3

纸张	价值	纸张	价值
大白鹿纸	1 钱 5 分	油纸长陆尺宽肆尺	2 分 7 厘
白翠榜纸	1 分 2 厘	总经黄经(每本)	4 钱 5 分
江南纸	2 分 7 厘	挂钱(每百张)	1 钱 3 分 5 厘
杭州毛头纸	1 厘 5 毫	双层高丽油单	4 钱 5 分
白抬连纸	1 厘 5 毫	黄龙笺纸	3 分
本折子(每个)	1 分	洒金鲜红纸	4 分
油纸长捌尺宽陆尺	3 分 5 厘	月蓝绿紫色研花纸	3 厘 5 毫
油纸见方壹丈	9 分	黄白鹿纸	3 钱

①迈柱等纂:《九卿议定物料价值》卷首奏疏,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 317 册,据清乾隆元年武英殿刻本影印,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23-24 页。另参考程婧:《〈物料价值则例〉和有关资料的分析》,清华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第 11-12 页。

②详见《九卿议定物料价值》卷二下、卷四下,《故宫珍本丛刊》第 317 册,第 119-121、197-199 页。

③参考艾俊川:《“连四纸”笺释》,《文津学志》第 11 辑,2018 年,第 154-159 页。

(续表)

纸张	价值
香色小笺纸	1 厘 5 毫
三白纸	3 毫
夹榜纸	9 厘
细油纸长伍尺宽叁尺	1 分 4 厘 4 毫
油纸(每刀)	2 钱 7 分
黄高丽纸	5 分
黄金笺纸	3 分
各色高丽蜡花纸	1 钱
各色开花连肆纸	1 分
深红纸	2 分
京高纸	1 厘
高丽油纸	4 分
大连柒纸	1 厘 3 毫
山东呈文纸	1 分
红金皮	1 钱
黄金皮	9 分
银皮	6 分
羊皮金	1 钱 6 分
方高纸	1 厘
元连纸	9 毫
头号高丽纸	8 分
贰号高丽纸	4 分
棉料连肆纸	6 厘 3 毫
竹料连肆纸	5 厘 5 毫
大碌纸	2 分 4 厘 3 毫
京红纸	2 分
福建大官青纸	2 钱 3 分 5 厘
小官青纸	3 分 1 厘 5 毫
大白棉料呈文纸	1 分 8 毫
白棉料呈文纸	4 厘
山西呈文纸	3 厘 5 毫
山西大毛头纸	1 厘 3 毫 5 丝
山西小毛头纸	1 厘
各色笺纸	3 分
伍色蜡花纸	3 厘 3 毫

纸张	价值
各色呈文纸	4 厘
刷黄表纸	3 厘
黄西呈文纸	4 厘
将乐纸	1 厘
小连柒纸	5 毫
白表料纸	1 厘 1 毫
南红纸	1 分 5 厘
各色西纸	1 厘 5 毫
各色连肆纸	8 厘 5 毫
大刷黄连柒纸	1 厘 2 毫
各色高丽纸	3 分
白栾纸	1 厘
黄本纸	6 厘 5 毫
油单纸	2 分
直符纸	2 厘 5 毫
双南红纸	2 分 2 厘
木红纸	8 厘
南毛边纸	7 厘
大曹黄纸	1 厘 2 毫
章金	5 厘 5 毫
章银	4 厘 5 毫
金银箔	1 毫 5 丝
各色京文纸	2 厘 5 毫
各色毛边纸	1 分
各色连柒纸	1 厘 5 毫
各色榜纸	1 分
山西油纸	2 厘
衢红纸	3 分
棉纸长捌寸宽陆寸	1 厘
贰白栾纸(每刀)	3 分 3 厘
方蓝纸(每刀)	6 分 7 厘
连肆抄(每刀)	1 钱
双层毛头纸	2 厘 3 毫 4 丝
南小青纸	1 分 5 厘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所开列的纸张,并无“开化纸”之名,而“榜纸”一系,也只分出白翠榜纸、夹榜纸与各色榜纸三类。不过,清宫确实有例行采购“开化白榜纸”的纪录。乾隆年间,户部每年奏报翌年预计采购的纸张种类、数量、金额,备供各单位支领使用。在史语所藏明清档案中,有一件乾隆五年(1740)三月二十四日,吏部尚书讷亲协理户部事务并管理户部三库(银库、缎疋库、颜料库),奏报颜料库备办解送翌年需用纸张事宜的档案。奏曰:

奏为奏明办解纸张事。查得候补行人司行人李世裔、太常寺典簿李世裕应办颜料库乾隆辛酉年分竹料呈文纸伍拾万张、五折黄榜纸伍千贰百伍张、开化白榜纸柒千贰拾五张、毛边纸贰拾伍万张、棉料呈文纸捌拾万张、白棉榜纸肆拾万张、池州毛头纸叁百叁拾万张、清水连四纸贰拾万张、竹料连四纸叁拾万张、太史川连纸陆拾万张,共计价值银贰万陆千叁百伍拾肆两肆钱伍分。内除节省银伍千壹百叁拾陆两陆钱玖分外,再查五折黄榜纸、开化白榜纸、白棉榜纸向例办解每张准销壹分贰厘,在京采买每张准销壹分;棉料呈文纸办解每张准销陆厘肆毫,在京采买每张准销四厘。是京城铺户既以壹分及肆厘发卖,则此内自必仍有馀剩,而李世裔等办解价值反昂于商贾,似属未协。应将前项纸张照在京采买定价,五折黄榜等纸每张俱准销壹分,棉料呈文纸每张准销肆厘,共核减银贰千柒百肆拾肆两肆钱陆分,实领银壹万捌千肆百柒拾叁两叁钱。俟命下之日,照例给与李世裔等批文、信票前往采办。行文该抚,除五折黄榜纸、开化白榜纸、棉料呈文纸、白棉榜纸、太史川连纸照在京采买定价办解,毋庸给发水脚外,其前项纸张价值银两并应给水脚照数给发,至节省银伍千壹百叁拾陆两陆钱玖分并核减银贰千柒百肆拾肆两肆钱陆分,扣存藩库,委员解部可也。为此,谨奏请旨。乾隆伍年叁月贰拾肆日交与奏事郎中张文彬等转奏。本日奉旨,知道了,钦此。^①

其后在乾隆六年(1741)、九年(1744)、十四年(1749),各年度采购数量如表4所示或有不同^②:

①明清档案,登录号:023775-001,《奏报颜料库辛酉年应办纸张应照在京定价采买》。

②明清档案,登录号:016664-001,《户部为办解乾隆壬戌年纸张事宜》;明清档案,登录号:022632-001,《奏报乾隆十年应办纸张水脚价银应照数给发》;明清档案,登录号:024479-001,《奏报采办乾隆辛未年各项纸张用银应照例给发》。

表 4

年度	纸张	数量(张)	比例	年度	纸张	数量(张)	比例
乾隆五年	竹料呈文纸	500,000	7.80%	乾隆九年	开化白榜纸	7,000	0.10%
	五折黄榜纸	50,250	0.78%		棉料呈文纸	400,000	5.44%
	开化白榜纸	7,025	0.11%		五折黄榜纸	6,000	0.08%
	毛边纸	250,000	3.90%		京高纸	400,000	5.44%
	棉料呈文纸	800,000	12.49%		竹料呈文纸	450,000	6.12%
	白棉榜纸	400,000	6.24%		毛边纸	300,000	4.08%
	池州毛头纸	3,300,000	51.50%		白棉榜纸	300,000	4.08%
	清水连四纸	200,000	3.12%		四折黄榜纸	40,000	0.54%
	竹料连四纸	300,000	4.68%		池州毛头纸	5,000,000	68.00%
	太史川连纸	600,000	9.36%		清水连四纸	200,000	2.72%
乾隆六年	五折黄榜纸	6,000	0.10%	乾隆十四年	竹料连四纸	250,000	3.40%
	开化白榜纸	8,000	0.14%		开化白榜纸	10,000	0.14%
	棉料呈文纸	800,000	13.88%		五折黄榜纸	10,000	0.14%
	白棉榜纸	400,000	6.94%		白棉榜纸	300,000	4.29%
	池州毛头纸	3,000,000	52.05%		棉料呈文纸	1,400,000	20.00%
	清水连四纸	200,000	3.47%		池州毛头纸	4,500,000	64.29%
	竹料连四纸	100,000	1.73%		毛边纸	250,000	3.57%
	竹料呈文纸	400,000	6.94%		竹料呈文纸	450,000	6.43%
	毛边纸	250,000	4.34%		白脆榜纸	80,000	1.14%
	太史川连纸	600,000	10.41%				

这些看似重复性高且多为循例照章办理的公务文书,正可为后人探求清代宫廷使用开化纸暨相关纸品的具体情形,提供若干有意义的证据和线索。首先,乾隆年间内府确实曾经固定采购开化榜纸,但数量占比极低,似乎不太像是常态需求或提供大规模文书抄写、书籍刊印等用途。其次,彼时内府督办官员、承办采买人员乃至抄造贩售商号对各色纸张的名目,皆有明确的称呼和分类标准,呈文纸有竹料、棉料,连四纸有清水、竹料,榜纸有五折黄榜纸、开化白榜纸、白棉榜纸等区别,不致淆混。再者,仅就乾隆五年的采购价格而言,五折黄榜纸、开化白榜纸、白棉榜纸每张价银壹分,棉料呈文纸价银四厘,与前述《九卿议定物料价值》所载各色榜纸以及白棉料呈文纸的价格大致吻合。最后,开化白榜纸因在京城办解,故不再发给承办人员赴外省采买的差旅费用,意指京中已有稳定的产制或经销网路,无需自外地办解送。

乾隆四十三年(1778),户部题奏前一年宫中各处包括军机处、六部、翰林院、国子监、钦天监、三通馆、方略馆、四库全书馆等 37 个单位所领用的纸张、颜料、缎疋等物品项目暨数量,并逐一核对,列出较前一年多领用的品项

数量^①。现将户部原折内开列 34 种纸张名目、数量列成表 5 如下：

表 5

纸张	数量(张)	比例	纸张	数量(张)	比例
高丽纸	206	0.0065%	双抄呈文纸	20,500	0.6485%
黄高丽纸	130	0.0041%	黄本纸	58	0.0018%
金线榜纸	61,450	1.9441%	红本纸	17	0.0005%
白榜纸	206,296.5	6.5265%	连四纸	18,551.5	0.5869%
五折白榜纸	800	0.0253%	磁青纸	6	0.0002%
黄榜纸	38,964	1.2327%	连七纸	13,087	0.4140%
五折黄榜纸	200	0.0063%	黄连七纸	9,572	0.3028%
红榜纸	79	0.0025%	青连七纸	3,300	0.1044%
蓝榜纸	4,700	0.1487%	太史连	6,000	0.1898%
夹板青棉榜纸	15	0.0005%	红纸	188	0.0059%
开化榜纸	3,184	0.1007%	巨红纸	6	0.0002%
呈文纸	713,478	22.5719%	中棉红纸	250	0.0079%
黄呈文纸	650	0.0206%	裱料纸	9,408	0.2976%
黄笺纸	1,387.5	0.0439%	白鹿纸	700	0.0221%
川连纸	94,255	2.9819%	扛连纸	1,444,444 又 7 篓	45.6969%
毛头纸	304,836	9.6439%	毛六纸	4,770	0.1509%
毛边纸	198,871	6.2916%	南砂纸	560	0.0177%

尽管纸张品目愈繁,开化榜纸领用数量也甚少,但就所占全年宫内各处领用纸张总量的比例而言,竟与三十年前户部采买全年需用总量的比例几乎雷同,皆为 0.1%。这是否意味着:开化(白)榜纸在清宫中的用途、用量一直以来都相当稳定与规律,并且扮演比较封闭的角色,几乎不曾和其他纸张的任务重迭或代换?难道正因如此,开化(白)榜纸的名号在大部分的宫廷事务中绝少有机会提起,唯有在特定的制度情境或行为规范之下,才能偶然发现它的踪迹?如果开化榜纸、开化纸也是一种用来缮写文件或者印制书籍的纸张,它又将承载怎样的文献内涵呢?

在一档典藏朱批奏折中,有一件档案明确告诉我们:清宫每年固定使用开化纸、呈文纸、台连纸,印造颁发满文、蒙文与汉文《时宪书》。乾隆二十九

①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军机处档,统一编号:故机 021247,《咨军机处为抄送出宗人府等衙门乾隆四十二年分领用过纸朱颜料缎疋等项奏销案》,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六日。

年(1764),适逢翌年二月遇有闰月,故钦天监在编修、印制乾隆三十年各种《时宪书》时,须较往年多领取这三种纸张。这份应当仍是由户部呈报的折件,清楚奏明缘由,并且详述钦天监多领开化纸 478.5 张、呈文纸 48469 张、台连纸 18144 张的核算方式。奏曰:

查得钦天监乾隆二十九年较二十八年多领开化纸四百七十八张半,呈文纸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张,台连纸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四张,黄榜纸一百六十一张半,毛头纸十二张半,银朱二两四钱六分八厘,南烟子四斤一十五两七钱二分四厘,广胶一十三两八钱六分四厘,羊油蜡烛一百八十枝。以上九项,缘二十九年系办有闰月《时宪书》,故多领开化、呈文、台连三项纸张。

再准理藩院文开内阁抄出奉旨:大臣驻扎各回子城伯克、头目、乌良海之总管,俱着给与蒙古《时宪书》,伊犁亦酌给与。钦此,钦遵。今查得各回子应给《时宪书》四百八十八本,伊犁应给《时宪书》六十七本,共五百五十五本知照到监,故多领呈文、黄榜、毛头三项纸张,并银朱、烟子、广胶等项。

再二十九年忻贵妃金棺暂行安奉静安庄指更候时,故多领羊油蜡烛。此二十九年比二十八年纸张等九项多领缘由,并详查细数,开列于后。计开:

开化纸满《时宪书》七十五本,蒙古《时宪书》七十五本,满《七政时宪书》七十五本,每本闰月添六页,共添一千三百五十页;每四页合整纸一张,共合整纸三百三十七张半。汉《七政时宪书》七十五本,汉《时宪书》一百二十本,每本闰月添三页,共添五百八十五页;每六页合整纸一张,共合整纸九十七张半。

以上添开化整纸四百三十五张,加破四十三张半。通共添整纸四百七十八张半。

呈文纸满《时宪书》一万一千七百八十本,蒙古《时宪书》八千五百八十一本,每本闰月添六页,共添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六页;每四页合整纸一张,共合整纸三万零五百四十一张半。满《七政时宪书》二十八本,每本闰月添六页,共添一百六十八页;每二页合整纸一张,共合整纸八十四张。汉《七政时宪书》六百本,每本闰月添三页,共添一千八百页;每四页合整纸一张,共合整纸四百五十张。汉《时宪书》五千一百九十九本,每本闰月添三页,共添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七页;每六页合整纸一张,共合整纸二千五百九十九张半。添给回子并伊犁蒙古《时宪书》五百五十五本,每本九十页,共四万九千九百五十页;每四页合整纸一张,共合整纸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七张。

以上共添呈文纸四万六千一百六十二张,加破二千三百零七张。通共添整纸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张。

台连纸汉民《时宪书》三万五千零四本,每本闰月添三页,共添十万零五千零一十二页;每六页合整纸一张,共合整纸一万七千五百零二张加破六百四十二张,通共添整纸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四张。

黄榜纸添领一百六十一张半,毛头纸添领十二张半,银朱二两四钱六分八厘,烟子四斤一十五两七钱二分四厘,广胶十三两八钱六分四厘。以上五项,系添造回子并伊犁蒙古《时宪书》用。^①

从呈报内容可知:至少在乾隆三十年以前,宫中订有成例,每年需用开化纸印制满、蒙文《时宪书》各75本,汉文《时宪书》120本,满、汉文《七政时宪书》各75本,共计420本;呈文纸需印26188本(尚不包含来年新增颁给伊犁与各回部的555本),台连纸需印35004本,较开化纸印本多出数十近百倍。再由多领纸张的统计方式,可以想象满、蒙文本的《时宪书》与《七政时宪书》每册页数因字形结构和版面配置所需,约较汉文本多出一倍;刊印“书页”与消耗“整纸”的对应关系,意指无论使用任何一种纸别刷印《时宪书》或《七政时宪书》,满、蒙文书册开本皆要较汉文本为大,以示主从等次有别。

那么,何谓《时宪书》?为何每年要分别使用三种不同纸张各刷印满、蒙、汉文本?又是甚么原因,导致开化纸印本的数量对比于呈文纸、台连纸印本,差距如此悬殊?

《时宪书》乃清代官方编制并颁行天下的历书。掌控历法、制定历书、颁朔授时,是帝制时期统治者拥有至高权柄与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象征,攸关整个国家典章制度与社会民生百业的运行秩序。满人入关后,采用西洋新法修造新历,顺治二年(1645)告成,赐名《时宪历》,“以称朝廷宪天义民至意”^②。乾隆年间为避弘历名讳,始改题曰“《时宪书》”。清钦天监所制时宪书,有《时宪书》《七政经纬躔度时宪书》以及《五星相距(凌犯)时宪书》,内容各有不同^③。原则上在每年二月初一日,钦天监就必须预先推算、修订并进呈明年度的《时宪书》与《七政时宪书》汉文本,经皇帝御览后,再翻译为满文、蒙文,分别刊印成书;四月初一日,由兵部驿送各省布政使司历书样本

^①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525-062,《呈钦天监乾隆二十九年较二十八年多领开化纸等项数目清单》。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1658页。

^③详见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卷六二,清嘉庆二十三年武英殿刊本,叶一至三。注文中详列各时宪书细目,因非本文探讨重点,不予细述。

各二本,一本钤“钦天监时宪书之印”存署,一本不钤印供照式刊刻,届期再颁行本省官民;十月初一日黎明时分,钦天监和礼部会筹办隆重的仪节规程,正式向皇帝、后妃进献《时宪书》《七政时宪书》并颁给王公百官。三品以下的八旗暨各部院衙门官员,由钦天监交予各旗、各衙门分发,蒙古藩王则由理藩院颁发^①。所有进呈、颁发需用的《时宪书》《七政时宪书》数量,正如前段引述折件所列,总计超过六万本。

正因为每年颁发《时宪书》耗用资财如此之巨,当中极有可能因为某些单位重复支领或实际应用机会甚低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乾隆三十年七月,大学士傅恒等人议奏重新检讨颁发各衙门时宪书数量,并研拟酌与裁减的具体方案,获得乾隆皇帝批准施行。根据史语所藏明清档案遗存一份礼部移会稽察房查照的奏折抄件,我们不仅得见未能备载于史册的制度运行细节,更令人感到振奋的,是整份奏折乃以钦天监每年印制《时宪书》所用三种纸别为总纲,按类条陈礼制成例暨兴革拟案,充分证明清宫确实使用开化纸刷印《时宪书》与《七政时宪书》,并且作为历年颁朔典仪的关键“礼物”。由于这件档案条理明晰、内容详实,对厘清古籍开化纸印本诸多疑问难题之意义至关重大,极具代表性,故不惮繁细,迳录全文如下(部分段落为笔者所分):

查得钦天监印造《时宪书》,向来分为三项:开化纸大板《七政》《时宪》各书,系供奉大内及分颁各王公等;呈文纸官板《七政》《时宪》各书,系分颁大臣官员;台连纸小板,只有汉字《时宪书》一项,系分给各衙门及奉天、顺天各属公用。

开化纸大板各书,向以清、汉字《七政书》,清、汉、蒙古字《时宪书》各一本,共五本为一分。臣等遵旨将《七政》《时宪》各书五本为一分者,酌留两分,一分进呈皇太后,一分进呈皇上,其余俱以清、汉字《时宪》二本为一分。应将清、汉字《七政书》,蒙古字《时宪书》俱行裁减。其呈文纸官板《七政》《时宪》各书,除《七政》一书惟钦天监在所必需,难以裁减,其余各衙门自毋庸颁给。再查,向例满洲大臣官员只颁清字《时宪书》,蒙古大臣官员只颁蒙古字《时宪书》,汉大臣官员只颁汉字《时宪

^①详见伊桑阿等纂:《大清会典》卷一六二,清康熙间刊本,叶一至十二;允禄等纂:《大清会典》卷二四六,清雍正十年武英殿刊本,叶一至十五;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三〇,清嘉庆二十三年武英殿刊本,叶一至二十一;特登额等纂:《钦定礼部则例》卷一四〇,清道光二十四年武英殿刊本,叶一至八。另参考春花:《论清代满文〈时宪书〉内容版本及颁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72-77页。

书》，蒙古各部落只颁蒙古字《时宪书》，尚无重复支领之处。唯陵寝及盛京、吉林乌拉向来颁给清、汉字两项《时宪书》，实属重复，应将汉字《时宪书》裁减，嗣后只颁清字《时宪书》。再查，京城各员既已按名分给，而各衙门又颁公用之书，亦属浮多。蒙古《时宪书》颁发喀尔喀及内札萨克原定六千余本，为数过多。至台连纸小板汉字时宪书，不过分给各衙门公用及散给书役人等，竟有多至三千余本及千有餘本不等，更属虚糜。

以上各书，臣等量其应需之数存用，餘俱酌减，共减去各色纸张清、汉、蒙古字各书共一万五千五百四十二本，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命下交与该部钦天监遵照办理可也。谨奏。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

钦天监每年印造开化纸大板书四百二十本，内清字《七政书》七十五本、汉字《七政书》七十五本、清字《时宪书》七十五本、汉字《时宪书》七十五本^①、蒙古字《时宪书》七十五本。向来以清、汉字《七政书》各一本，清、汉、蒙古字《时宪书》各一本，共五本为一分，进呈皇太后一分，进呈皇上一分，大内位分十二分，共十四分。颁发诸王、贝勒、贝子、公四十二分，公主二分。王公等亦系五本为一分；公主向不颁给《七政书》，以清、汉、蒙古字《时宪书》各一本，共三本为一分。又颁发朝鲜国王汉字《时宪书》一本，武英殿用汉字《时宪书》十四本，掌仪司用汉字《时宪书》十二本，共用书三百一十三本。餘书一百零七本，向系该衙门留用。今遵旨将清、汉字《七政书》，清、汉、蒙古字《时宪书》五本为一分者，酌留两分，一分进呈皇太后，一分进呈皇上。大内十二位分应否裁减清、汉字《七政书》各一本，及蒙古字《时宪书》一本，以清、汉字《时宪书》二本为一分之处，伏候钦定。其诸王、贝勒、贝子、公、公主等，皆将清、汉字《七政书》，蒙古字《时宪书》减去，只以清、汉字《时宪书》二本为一分。朝鲜国王照旧颁发汉字《时宪书》一本，武英殿、掌仪司各留汉字《时宪书》二本，即足数用，餘俱应裁。至该衙门留用餘书一百零七本，一并裁减。谨将细数开列于后：

原定开化纸大板书四百二十本内，清字《七政书》七十五本，酌减七十三本；汉字《七政书》七十五本，酌减七十三本；汉字《时宪书》一百二

^①此处与前引一档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525-062）所记120本不同，又加总后尚不及420本，系抄录时误记数字。后文汉字《时宪书》仍记为120本。

十本,酌减二十二本^①;蒙古字《时宪书》七十五本,酌减七十三本。共减书二百四十一本,应留书一百七十九本^②。

每年印造成文纸官板清字《七政书》二十八本,向来颁发各衙门一十九本,钦天监留用九本。清字《七政》一书,原无查用之处,俱应裁减。

原定呈文纸官板清字《七政书》二十八本,全数裁减。

每年印造呈文纸官板汉字《七政书》六百本,向来分给各衙门三百七十本,钦天监留用二百三十本。《七政》一书,各衙门原无查用之处,惟钦天监官员、天文生一百九十六员职司推算,算学官生四十三名亦皆学习天文,每名各给一本,以备查用外,余俱裁减。

原定呈文纸官板汉字《七政书》六百本内,酌减三百六十一本,应留书二百三十九本。

每年印造呈文纸官板清字《时宪书》一万一千六百二十本^③,向来分颁满洲八旗文、武大臣官员每员一本,共九千一百九十八本;又分给陵寝及东三省等处满洲大臣官员二千一百七十五本;又分给乌里雅苏台、伊犁、各回部办事大臣官员一百六十本。以上俱系按名分给,毋庸裁减。照旧颁给外,惟分给各衙门公用之书一本以至三本不等,共书三十一本,似属重复支发,又余书九十六本,向存该衙门,亦属浮多,俱应裁减。

原定呈文纸官板清字《时宪书》一万一千六百二十本内,酌减一百二十七本,应留书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三本^④。

每年印造呈文纸官板汉字《时宪书》五千四百四十九本^⑤,向来分颁八旗汉军大臣官员每员各一本,共九百零七本;又分给各衙门汉大臣官员共三千六百四十六本。以上俱系按名支給,毋庸酌减。又颁给朝鲜国一百本、顺天府二本、马兰镇等处三十七本、龙虎山道录司等九本,俱应照旧颁发。至伊犁及各回部,虽已颁发清书,但原定汉书二百一十八

①前文开列应保留之汉文《时宪书》共63本:皇太后1本、皇帝1本、大内位分12本、王公42本、公主2本、朝鲜国王1本、武英殿2本、掌仪司2本。故原印120本,应裁减57本。

②此处未列出满文《时宪书》应减、应留书数目。前文开列应保留之满文《时宪书》共58本:皇太后1本、皇帝1本、大内位分12本、王公42本、公主2本。故原印75本,应裁减17本。全部开化纸本《七政书》、《时宪书》420本,应裁减293本,留书127本。

③此处与前引一档藏朱批奏折所记11780本不同。

④前文所列呈文纸印满文《时宪书》应留书共11533本,应裁书共127本,二者合计为11660本。

⑤此处与前引一档藏朱批奏折所记5199本不同。

本分散各处,原属无多,亦应照旧颁发。乌里雅苏台向来颁给汉书六十本,今据该将军咨请裁去汉书二十本,添发蒙古字书二十本,应照所请颁发外,所有分给各衙门公用之书三十一本,系属重复。至陵寝及盛京、吉林乌拉等处官员,既已给与清书,又发汉书二百七十一本,亦属重复,又余书一百零六本,向系该衙门留用,更为浮多,俱应裁减。

原定呈文纸官板汉字《时宪书》五千四百四十九本内,酌减书四百零八本,应留书五千零四十一本^①。

每年印造呈文纸蒙古字《时宪书》九千零三十八本^②,向来分颁八旗蒙古大臣官员每员各一本,共一千四百四十九本;又颁发东三省、查哈尔八旗蒙古官员七百八十三本。以上俱系按名支发,毋庸裁减。又颁发伊犁、乌里雅苏台一百八十本,各回部五百五十本,俱系酌定之数,尚无浮多。伊犁、乌里雅苏台照旧颁发,各回部内裁去乌什应领书八十本,只发书四百七十五本。所有分颁各衙门公用之书二十五本原属虚糜,应行裁减。至颁发喀尔喀及内札萨克之书六千零六十一本,原定之数过多。今酌定喀尔喀四部落,每部各给三百本;内札萨克六处盟长,每盟长各给三百本,即足分用。应减去三千零六十一本,只发书三千本。

原定呈文纸蒙古字《时宪书》九千零三十八本内,酌减书三千一百五十六本,应留书五千八百八十三本。^③

每年印造台连纸小板汉字《时宪书》三万五千零四本内,向来分颁奉天、顺天等十一府,每府各一千本;大宛二县,每县各九十本;承德州三百本,广昌县二百本,共一万七千八百本,以为各衙门公用及分给书役人等之用,久经酌定之数,毋庸裁减。照旧颁发外,惟分给内阁六部各衙门之书,每处三千余本至一千余本不等,共书一万七千二百零四本,实属浮多;各处酌留二、三百本,即足敷用。今酌定内阁六部、理藩院各留三百本,其余各衙门各留二百本,其原定之数在二百本以内者,照旧支发,余俱裁减,共减书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一本。

原定台连纸小板汉字《时宪书》三万五千零四本内,减书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一本,应留书二万三千七百八十三本。

以上原定各色纸张清、汉、蒙古字《七政》、《时宪》各书,共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本,内酌减一万五千五百四十二本,应留书三万六千一百九

①前文所列呈文纸印汉字《时宪书》应留书共 4959 本,应裁书共 428 本,二者合计为 5387 本。

②此处与前引一档藏朱批奏折所记 8581 本不同。

③前文所列呈文纸印蒙文《时宪书》应留书共 5882 本,应裁书共 3166 本,二者合计为 9048 本。

十七本^①。

这次研拟的改革方案,整体缩减历书印制数量约四分之一(若按原折所记数字计算则为三分之一);换言之,实施后每年将节省户部一定比例的纸张、绫绢、颜料、工价银两等支出。综观傅恒等人所奏内容,大抵着眼于固守历书所象征的皇朝传统,强调历书颁发的实用性与必要性,注重制度规划施行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即时因应个别需求调整政策内容;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积极降低因预估浮滥、重复支领或多馀库存造成的财物耗损。当然,这件档案对于开化纸的文献考索或实物验证而言,则是首度完整揭示开化纸印本古籍的具体对象、制作背景、象征意义及其所承担的功能角色。清内府采用开化纸印制《时宪书》,绝非阶段性产物或偶一为之、特意经营的殿堂陈设布置。《时宪书》作为代表皇权与天下一统的国家典册,其自身定位、意义在根本上便与一般图书出版乃至官方主导的文教成果有着显著的区别;从职掌分工、推算编订、缮写进呈、翻译刊版、选纸刷印、按式装潢、赏赐颁发,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遵行法度,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礼制。开化纸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中规律、稳定地存在着,并且被安顿在一个格外崇隆的位置上。

再结合康熙以至道光朝《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与《礼部则例》的相关记载,可以提供我们想象抑或更进一步追查《时宪书》开化纸印本传世实物的具体样貌。试就史籍与档案文字综整推敲,至少在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十月初一日,钦天监进呈供奉大内暨分颁各王公的历书,均含满、汉、蒙文《时宪书》各一本,满、汉文《七政时宪书》各一本,共五本为一份,皆为所谓“大板”开化纸印本,其装潢款式必须严格遵守进呈对象的尊卑品级:皇太后、皇帝、皇后“用黄绫壳面、套,黄罗销金包袱包封”,即书册覆以黄绫壳面,用黄绫函套装盛,外层再以黄罗销金包袱封裹,最显尊贵;皇贵妃、贵妃、妃“均用金黄绫面、套,金黄罗销金包袱包封”;嫔“用红绫面,无套,红罗销金包袱包封”;皇太子“用黄绫壳面、套,黄素绫包袱”。以上几种进呈本历书,首页都不钤盖钦天监印信。此外,颁赐亲王、郡王“用红绫面,红罗销金包袱包封”。这样的装潢形制,与明代进呈会试录颇有一脉相承之意。明人俞汝楨纂《礼部志稿》载曰:

进试录例用黄绫壳一本、红绫壳二本,俱用销金黄、红包袱,本部尚

^①明清档案,登录号:102355-001,《礼部为裁减各衙门时宪书由》。若按原文所列各色纸张满、蒙、汉文《七政》《时宪》各书总数,应为62159本,共裁减15542本,保留46617本。现经复核各项所列裁减细目暨数量,则总数应为62087本,共裁减15624本,保留46463本。

书及郎中呈进。有太后、中官、东官仍各备红绫壳三本,俱用销金红包袱呈进。^①

又,贝勒用红绫壳面,贝子、公为黄裱纸壳面,以上皆以红棉纸包封。颁赐公主之《时宪书》,改为满、汉、蒙文三本一份,用红绫面、红棉纸包封;颁赐朝鲜国王汉文《时宪书》一本,亦用红绫面^②。至于颁赐八旗暨各部院衙门满、蒙、汉大臣堂官的“官板”呈文纸印本《时宪书》,“均黄裱纸面,每旗、每衙门共一红棉纸包封”;颁给朝鲜国属官汉文《时宪书》一百本,系用黄纸面^③。以上几种赏赐本历书,首页皆需钤盖“钦天监时宪书之印”。

由此可见,清宫每年编印《时宪书》,有其明晰的制度背景与历史脉络。象征国家颁朔体制稳定运行的《时宪书》,从语文、用纸、开本、数量、装帧、钤印种种形式,乃至进呈、颁赐、转发、驿送、售卖等等程序,均有明确的规范,绝无混淆僭越的空间;采用开化纸印制的满、蒙、汉文《时宪书》与满、汉文《七政时宪书》,确实是当中数量最少、开本最大、级别最高、装潢最华丽的一种。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只需访查现存《时宪书》若有与前述开本、面料、函套、包袱、钤印等特征相吻合者,即可论定其为真正的开化纸印本,印书纸张亦足堪作为清代宫廷御用开化纸的标准样本。有关开化纸这一独特纸品或古籍开化纸印本的各种探索蠡测,或许至此也才可谓完成了从文献到实物的对应连结,以及从考证到验证的跨越突破,奠定有志者继续就不同层面剖析考求的新里程。

最后,还是要从档案文献里寻索证据,证明清宫所谓“开化纸”即“开化榜纸”。

乾隆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1751年5月20日),傅恒等人奏报户部三月分给发颜料纸张之项目数量,以日期为序,详细开载宫中各处取用香料、纸张、颜料、蜡、油、漆、墨、茶、蜜等种种物品的名称数量,并一一注明多少由库存支应,多少为额外采买。单就纸张一类,所列出自颜料库给发的品名就有榜纸、山西毛头纸、棉料呈文纸、红脆榜纸、黄脆榜纸、白脆榜纸、京高纸、白鹿纸、毛边纸、大官青纸、三号高丽纸、清水连四纸、南毛头纸、开化榜纸、竹

①俞汝樵:《礼部志稿》卷七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226-227页。

②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宪书》,红绫封面,首页钤“钦天监时宪书之印”,当即开化纸印本。纸张洁白,几无黄褐斑点。该院网站可检索、浏览全文影像:<http://e-kyujanggak.snu.ac.kr/home/main.do?siteCd=KYU>。

③奎章阁藏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时宪书》,黄纸面,封面刻“钦天监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封面、首页钤“钦天监时宪书之印”,当即呈文纸印本。观其纸色,与开化纸本接近,同属白纸一类。

料呈文纸、五折黄榜纸、金线榜纸、竹料连四纸等 18 种；另行采买给发的则有红榜纸、夹榜纸、抬连纸、黄榜纸、红毛头纸、黄毛头纸、双红纸、黄毛边纸、各色笺纸、山西呈文纸、刷黄裱纸、山西黄呈文纸、白栾纸、二白栾纸、大黄连七纸、连七纸、南红纸、京文纸等 18 种。数十种纸品名称不相杂混，可见确实存在因材质、规格、工法、产地、颜色而产生的命名差异与辨识原则。其中一段关于钦天监取用物料的记载，适足澄清吾人对于“开化纸”与“开化榜纸”名实释义的疑惑：

（初十日）钦天监取办造乾隆壬申年《时宪书》应用开化榜纸八千一百五十四张、竹料呈文纸四十四万二千三十九张五分、五折黄榜纸七千三百十六张、毛边纸三百四十张、山西毛头纸一千四百九十八张、榜纸三百二十一张、银朱十七斤九两一钱五分五厘、白蜡十四两九钱、广胶九十斤，系库中给发。

抬连纸二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九张五分、大黄连七纸二万一千四百五十八张、连七纸七千八百五十七张、红榜纸七十九张、南红纸三张、烟子五百十四斤十两三钱四分四厘、片红土十五斤十一两三钱六分、墨十二斤二两三钱五分，系采买给发。^①

钦天监为编订印造乾隆十七年（1752）《时宪书》，领取开化榜纸、竹料呈文纸与抬连纸，符合前引档案所载之制度、惯例。再查史语所藏明清档案另有一奏销折件，系户部汇奏乾隆十六年宫中各衙门领用纸张、颜料等物名目数量，明确载示“开花榜纸八千一百五十四张”，且较上年少领 1303 张^②，又与前引档案记载使用开化榜纸的数量完全一致。显然，至少在宗人府、吏部等 48 处，唯独钦天监特许准用开化纸印制《时宪书》，时而记作“开化榜纸”或“开花榜纸”。由此可知，至少在乾隆年间，钦天监刷印《时宪书》所用“呈文纸”乃“竹料呈文纸”，而“开化纸”即“开化（花）榜纸”的省称。“榜纸”品目纷繁、应用广泛，仅乾隆十六年三月宫内各处所用，就有榜纸、红脆榜纸、黄脆榜纸、白脆榜纸、开化榜纸、五折黄榜纸、金线榜纸、黄榜纸、红榜纸、夹榜纸等 10 种^③。这样看来，至少在清代内府经办人员以及抄造制作工匠的观念图谱中，“开化纸”乃属榜纸一系的独立品种，是钦天监每年印造大开本《时宪书》进呈御览、供奉大内并分颁王公的专用纸张，稀罕、独特且尊贵。

①明清档案，登录号：019860-001，《户部为三月分给发颜料纸张等项数目事》。

②明清档案，登录号：145384-001，《户部为岁底汇奏事》。

③经比对傅恒四月奏报与户部全年汇奏内容略有不同，后者未记红脆榜纸、白脆榜纸、五折黄榜纸等三种，且将“黄脆榜纸”记作“黄翠榜纸”。

五、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结合档案文献与书籍实物的相互印证,或可得出若干暂时性的结论:

首先,就目前陆续整理公布的档案文献略加披检查考,部分对于古籍刷印装潢所用纸张、织品等物料的记载描述,确实可和若干传世书籍直接对应,互补互证,这是研究古籍版本、物质文化特别是探索清宫典籍制作、制度、工艺的特殊优势。而至今唯一有确切证据的开化纸印本古籍,乃清乾隆年间钦天监每年例行编制刷印的《时宪书》,分别采用开化榜纸、竹料呈文纸、抬连纸印制。在档案中“开化(花)榜纸”应当也叫“开化白榜纸”,简称为“开化纸”,属于榜纸一系的独立纸品。这种纸张每年在京采买,不必另赴外省,采购数量稀少,用途也十分固定,几乎专供印制最高规格的《时宪书》,十分尊贵罕见。尽管开化纸的价格不算最贵,确实是宫廷御用等级最高的纸张之一。钦天监用开化纸印《时宪书》的实例,适足填补清代内府刻书的一处断裂与空白,也有助刷新长久以来人们对“殿版”图书的相关认知。

其次,人们盛赞明、清两代已知各种开化纸、开花纸或桃花纸印本,若以档案文献与现存实物相验证,大多载明为连四纸或清水连四纸刷印。因此,所有形容开化纸如何精好的材质特征或美感体验:洁白、柔软、薄细、致密、坚韧、滑润……等等,应当归诸连四纸,并且是为明以至清前期“细白结实”薄型连四纸的顶峰之作^①。按照清宫档案记载,连四纸一系与榜纸一系泾渭分明,各自独立不相淆混,只因连四纸与开化榜纸之纸色皆甚洁白,二者各自用以刷印的又都属于精刻初印、数量稀少、等级较高的进呈本、陈设本或赏赐本,或许早在皇宫大内便已于口说耳闻之际误认甚至讹传连四纸本为开化纸本。降至晚近,人们难于亲炙目睹真正的开化纸印本,遂仍用开化纸之名称呼连四纸所印诸书,兼及纸色质感类似的明版暨嘉庆、道光以后佳槧,就这么转衍成百数十年间张冠李戴的美丽误会。

既已确知真正使用开化(榜)纸刷印的书籍,势必带出一连串新的疑问,展开另一段求索的历程。目前存世的开化(榜)纸本《时宪书》分藏何处?数量几何^②?所谓“大版”书册开本的确切尺寸是多大?开化(榜)纸的颜色、

^①参考艾俊川:《“连四纸”笺释》,第154-159页。

^②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例,典藏清康熙元年(1662)至光绪十年之《七政经纬躔度时宪历》共113册,其中20册保持原有黄绫书衣,其余皆已重装,但推测原书亦应为黄绫面。朱书题签、无铃印,率多初印,纸色洁白,质地亦与其他连四纸本颇近。尽管符合前述大版开化纸本装潢特征,犹不及完整保留函套、包袱者更具说服力。

厚薄、帘纹、质地以及整体的感官体验等特征,与细薄的连四纸精品有何区别?若能更进一步取得残片样本,便能做出更精准多样的检测分析,建立真正属于开化(榜)纸的“元数据”(Metadata)标准^①。根据这些材料,可接续研究有关开化(榜)纸的原料、产地、抄造工艺、化学特性、保存条件、修护策略等等,亦有助于研制超越宫廷御用纸品质量的新纸种,开创传统手工造纸工艺的新典范。除此之外,明、清两代是否还有使用开化(榜)纸印制书籍或作其他任何用途的实例?清代使用开化纸、呈文纸、台连纸印造《时宪书》的制度惯例是从甚么时候开始的?三百年间是否有所更易?倘若能更深入探勘现存明、清档案史料,考掘与纸张相关的种种记载,相信还会有令人振奋的新证据、新发现。

最后,调查存世开化(榜)纸印本,或档案记载为连四纸而后人惯称开化纸、开花纸、桃花纸印本古籍之品种、数量,仍具意义;编制特定纸别的古籍书目,亦别开生面,能带动世人深入认识传统文化乃至工艺技术,近而凝聚各界积极维护、传承、发扬、创新的能量。唯无论调查或编目,凡鉴别审定必有标准。开化(榜)纸或连四纸印本的判定标准该如何建立?前贤编目著录的成果可否全然承袭或犹需重加甄辨?若遇有著录为同一纸别而纸色、厚薄、质感稍异,或相同印本被著录为不同纸别者^②,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书目著录资料当如何取舍裁断?若采行科学检测方式订立纸张之元数据标准,应如何妥善导入传世古籍的调查与编目实践中,在不损伤书籍纸页的文物保护前提下,准确有效地推动相关工作?这些从观念到方法的尝试与突破,令人期待,也将为古籍保护与研究的不同面向带出更丰富的可能性。

附记:拙文写作机缘,最初为2016年赴一档执行“潘思源先生赞助研究奖励计划”期间,获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邀请参加三周年院庆活动,遂将在京查检所得暨典守文物所见简要罗列,同与会专家交流。延至2019年中,始重新组织改写成拙文初稿,并于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古籍整理与特藏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专题报告。

【作者简介】曾纪刚,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书籍版本学、目录学、《四库全书》研究、清宫藏书研究。

①参考姚伯岳:《中国传统纸张研究策略断想——从开化纸说开去》,《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1期,第60-64页。

②例如汲古阁刊《汉隶字源》,民国十四年《文奎堂书目》与民国二十年《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皆著录为“开花纸”、“开花纸初印”,沈知方《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则著录为“白棉纸精刊初印”。